

最是一年春好时

□ 蝉羽

好像没有多少寒意的甲午马年冬天，在2月4日的下午，被一天一地明丽的阳光晒得慵懒绵软。腊梅的浓香还在制造一个个厅堂的温馨，人民公园门口、科华北路的中央隔离带，红艳明亮的樱花却招呼都不打，一夜之间饱满盛放，硬生生撞入眼帘闯进心内撑开思绪：哦，不是时序错乱，真的是春来了。

万物其实都其来有自。温暖总孕育于严冬，乌云之后也总存藏着太阳。楼宇高耸是因为它根基深扎，鲜花盛开离不开土壤温度和光。40岁女人的容颜，记录了她之前人生的春雨风霜，更映照着她内心的春雨风霜，抑或硬如钢。暴利式的搜刮基本会暴烈式的失去，谁

践踏了法律、尊严、自由、良知，到头来终会明了尊严与自由的真实、尊贵与奢侈。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应该活在树木和水塘之间，活在劳动和精神的自由之中，活在诗歌和艺术的边缘，活在有尊严的挚爱的生活之中。在以春的到来为开篇的生活序列里，希望这不是畅想，不是奢望，不是春节联欢晚会大腕演员煽情主持的心灵鸡汤。

因为马路太宽，因为车辆总是不见头不见尾而且与你挨得越来越近，因为周遭都是铁栅栏水泥桩，所以我们渴望一株树木迎风摇曳，一汪水塘涟漪波光，一点空间私密独享。我们坚信劳动是人类最崇高的义务，更坚信不是★★代的我们不劳动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坚信法律规矩的红线是不可触碰的边界，更坚信法律规矩的领地是精神徜徉的乐土、自由自在的围栏。坚信2015的中国，不再在古老欧洲深陷“男人买表女人买包”的暴发俗气，也不再在新兴东南亚屡屡制造大便小便的丑闻闹剧；不再等待余秀华们从底层乡村来到大都市教我们如何读诗，也不再突然闻听那个流连消磨了十年二十年的实体书店在秋风萧瑟中闭门关张。希望公共场所不要有那么多荷枪实弹的警察，倒地的老人立刻有温暖有力的搀扶，希望安静的广场舞

者与周边居民和睦共处，掌声与喝彩真正发自内心，而不仅仅因为乖戾的仇官仇富，甚至仅仅因为你有而我没有。希望嘹亮代替了太息，公平公正和公开砸碎了暗箱。

一切的结论也都蕴含着哲思的因果。在当下，“美女”是泛滥到男女老少都不在意的恭维，“淑女”“丽人”“名媛”“才女”却是少有人能够得到、敢于笑纳的精神长相。朱门往往伴随了发臭的酒肉，华服多包裹着干瘪霉变的心。“士人情怀”“家国天下”经常栖身在茅屋，精彩的演出不经意出现在简陋的舞台。如果财富集聚都因为劳动和创造，成功光环的背后都因为苦干加巧干，失败都因为懒惰甚至放弃，不如意者都认可是“良工无弃材”后的物竞天择，这世界和时事则会如美丽的赫本留下的美丽诗句：“若要优美的嘴唇，要讲亲切的话；若要可爱的眼睛，要看到别人的好处；若要苗条的身材，把你的食物分享给饥饿的人；美丽的秀发，在于每天有孩子的手指穿过它；若要优雅的姿态，走路时要记住行人不只你一个。”

诚如是，随春而立的，就不只是节令；当春而放的，更不只是花开。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迎春。最是一年春好处，且行且吟无昏晨。

巴蜀史志

(双月刊)
2015年 第1期
(总第197期)

主管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办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马小彬

副主任：王孝平

编委会：

马小彬 王孝平 汪毅

高志刚 陈思禄 李冠华

邱俊 李思源 余正道

王少卿 周正琴 余崇威

邓力群 夏建平 张聂熙

何斌 冉炬 饶松柏

王华 杨文 李卫东

任真 刘启蓉 尹克发

邓瑜 陶利辉 曾新苗

熊倩 孙玉峰

主编：马小彬（兼）

副主编：王孝平（兼）

编辑出版：《巴蜀史志》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熊倩

执行编辑：罗一洋

封面题字：何海霞

本刊地址：成都市永兴巷15号21楼

邮政编码：610012

编辑部电话：(028) 86522061

编辑部邮箱：bsszjb@163.com

印刷：四川川林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28)86980225

注：本刊如有印刷问题请与印刷企业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卷首

最是一年春好时

蝉羽

时政辑要

04 习近平：“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06 领导同志谈地方志工作

07 魏宏、钟勉肯定地方志工作

08 勤勉实干成效显著 突出特色再创佳绩

——中指组领导充分寄望四川地方志工作

黄绚 刘艳平

封面故事

10 眺远梁山寺 感悟剑门关

王少卿

13 崖前千佛客参禅

伊国华

15 昭化与丁宝楨

杨大明

志鉴研究

17 四川省旧志整理出版与利用情况述略 马小彬 朱丹

20 辉煌成果下的思考 钟再原

——四川省第二轮三级志书编修若干问题的反思

23 绵阳抗震救灾志编纂研究

余正道 晏茂川 李维怡 伍丹丹

26 写好志书概述 打造精品佳志

李长山

28 把好年鉴校对关口的几点看法

詹跃华

30 志书年鉴编辑工作小议

李志华

读志用志

33 试论新形势下地方志宣传工作

余崇威

——以内江地方志宣传工作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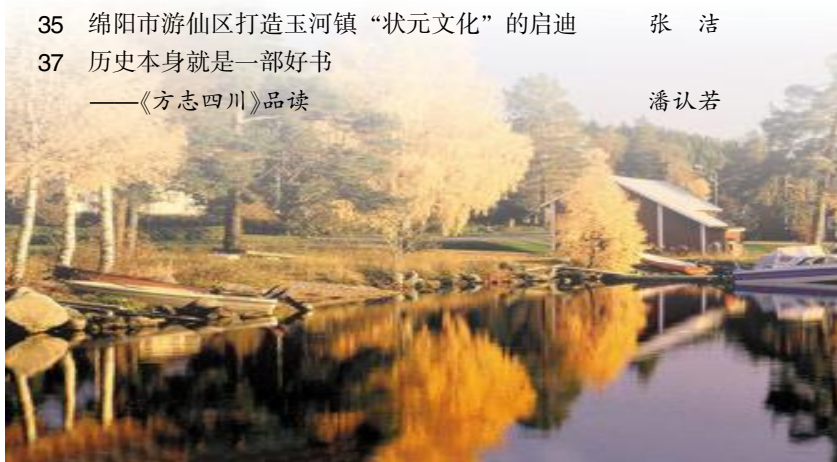
35 绵阳市游仙区打造玉河镇“状元文化”的启迪

张洁

37 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好书

——《方志四川》品读

潘认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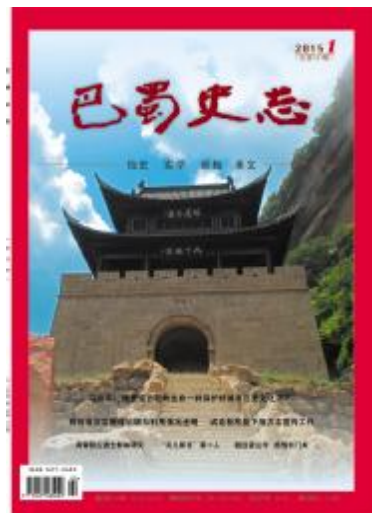


史料之窗

- 39 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研究 “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研究”课题组
45 “吊儿郎当”第一人 陈学林

蜀中人物

- 47 李调元及其方志思想 熊倩 曹鸿浙 罗一洋
50 黄辉与公安三袁 靳滇霞
53 万重桑海 潜闭琴书
——浣云公李鏞逸事 李斧



封面：广元剑门关

历史掌故

- 56 中国历史上的党争之祸

简讯

- 60 整治“庸懒散浮拖” 凝心聚力促发展
60 中指组领导来川调研《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制图工作
60 省地方志学会召开七届四次(在蓉)常务理事会议
60 《四川抗战历史文献》编纂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召开
61 省志编委调研省委统战部修志工作
61 省志编委调研凉山地方志工作
61 省志编委调研叙永、古蔺地方志工作
61 《四川省志》第二十二次终审会召开
62 《德阳春秋》专题化办刊服务时政
62 内江市中区创办方志期刊及网站
63 宜宾施行《宜宾市〈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
63 眉山开展“12·4”法制宣传
63 巴中着力施行《条例》以贯彻“依法治市”要求
63 泸州纳溪区志办八举措发掘地情资料
63 乐山沙湾区地方志工作创“新”三突出
63 木里加强地方志工作
64 越西强化史志工作与队伍建设
64 《德阳掌故(修订版)》出版发行
64 绵阳首部佛教志书《净安寺志》问世
64 《广安概览(1993—2005)》出版发行
64 甘孜州首部地方志编修业务工具书问世

出版时间 2015年2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1—265X
国内统一刊号 CN 51—1616/K
邮发代号 62—311
国内发行 四川省报刊发行局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广告许可证 川工商临许(2001)153号
定 价 7.00元

本刊部分图片系资料图片，请作者与本刊联系以奉稿酬



习近平：“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极为重视。他不仅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思想和观点，并且推动了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开创性实践，为延续福建文化的“根”与“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给福建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高瞻远瞩 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承载着这个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代表着这个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民族和国家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资源、未来的希望。“心有高标，方可致远。”思想是行动的指针。早在厦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对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很重视，到福州和省里工作后，他提出了很多极富远见的看法。在厦门任职时提出，需要警惕对历史文物的“建设性破坏”；任福州市委书记时说：“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



1997年6月30日，习近平出席林则徐出生地、故居、纪念馆等修复竣工仪式

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对如何处理传统历史风貌保护与现代城市建设的关系，习近平说：“我们认为，保护古城是与发展现代化相一致的，应当把古城的保护、建设和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之后，习近平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依然念之挂之，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中仍时不时亲自过问。2001年10月，在关于泉州、漳州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调研报告上批示：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文物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保护文物就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2年4月，在为《福州古厝》

作序中写到：“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保护好古建筑有利于保存名城传统风貌和个性。现在许多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毁掉许多古建筑，搬来许多洋建筑，城市逐渐失去个性。在城市建设开发时，应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这有利于保持城市的个性。”

古今兼容 既要加快城市发展和建设，也要保护好文化遗产，达致“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上世纪80年代起，福州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城市开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冲突也不时出现。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对保

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护、修缮林觉民故居，修复林则徐系列遗迹工作高度重视，力促其成；对邓拓故居、琉球馆等故居、历史文物的修复和保护，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守护有形文物这个文化载体，更是为了扬其“道”。在林则徐铜像揭幕仪式上，习近平满怀深情地说：“今天，故乡的人民树立起林则徐铜像，就是为了激励自己，教育后人，让在林则徐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永远发扬光大。”正是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中较好地处理了“古与今”的关系，福州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在发展中得到保护，在保护中得到了发展”。

短长兼顾 “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又要重视人文环境的保护”，文化就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源头很远，流过历史，流到今天，还要流向未来。文化是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需要数百年、数千年，甚至是数万年的积累。如果说保护文化遗产不仅留住了先辈栖居的物质场所，也为今人留下心灵的栖息地，那么找到通往一段尘封历史的入口，更是祖先的馈赠。2000年1月1日，

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对“关于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保护有关情况的紧急汇报”作出重要批示，明确指出：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一直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物，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他要求，“立即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对洞穴遗址群的保护……做到保护文物和发展生产两不误”。在省长任上，虽然谋发展抓建设等工作极为繁忙，但习近平对文化遗产保护仍然高度重视，并经常关心过问。如对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的进展十分关注，并积极协调推动有关工作；申遗成功后，为加强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将“双世遗”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出台《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

建章立制 在闽工作期间，习近平着眼长远，着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化、法制化，他为此做了多项开创性探

索和实践。现今的福州文博界，传颂着“四个一”（一个局、一个队、一颗印、一百万元）的佳话，而这正是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拍板解决的事。一个局，即成立了福州市文物管理局，并落实编制；一个队，即建立福州市考古队；一颗印，即从1992年开始，要求城建项目立项时需要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加盖市文管会（后改为市文物局）的印章；一百万元，即从1991年起，福州市财政每年拨款100万元作为全市文物修缮经费，以后逐年增加。20多年过去，“四个一”彰显的大胆创新精神，依旧熠熠生辉；“四个一”发挥的效应，依然惠泽长远。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以求延续民族的灵魂和血脉，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面对苍天知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据2015年1月6日《福建日报》《“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习近平在福建保护文化遗产纪事》摘编）

领导同志谈地方志工作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组组长王伟光在广东调研时，对推进地方志事业发展提出六点要求。一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地方志系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学习好、理解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地方志干部学习与培训的重要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把中央精神吃透。二是要把贯彻好、落实好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地方志工作的中心任务，抓好、抓紧、抓实，全面推动各项工作。要理思路、定目标、找定位、补弱项、抓落实，一定要有一个总体的方案，一项一项抓。三是按照“一纳入、八到位”的要求，逐项抓好检查督办，进一步推进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四是深入开展地方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地方志工作一定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有所作为，就要做到为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好务，把开发利用地方志文化资源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让领导觉得地方志办公室有用、能用，才能更加重视地方志工

作。五是要把握好新形势，积极推动地方志工作向基层延伸，努力做好乡镇和行业地方志工作。特别是要通过几年的时间，打牢市县地方志工作的发展基础，因地制宜发展好市县地方志工作。地方志工作要发展繁荣，关键是省市县三级联动，行业部门志、乡镇志编纂各显神通，形成科学完善的地方志工作体系和成果体系。六是认真总结经验，广泛开展调研，谋划好“十三五”发展规划，特别是谋划如何为三轮修志做好理论准备、资料准备和队伍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到河南省调研地方志工作时，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一是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批示和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吃准吃透并落到实处。二是进一步强化依法修志观念。地方志工作是官职、官责，是法定的任务，法定的政府行为，必须落实好。要依法建立制度来约束，用行政手段来推动工作，用行政监督来规范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特别是修志编鉴主业，就要依法修志、依法实现地方综合年鉴的全覆盖。三是小部门要干成大事。要有干成大事业的雄心，要服务经济社会发

大局，积极打造地方文化名片、智库和地情资料信息库。地方志要发挥资政、教化功能，就得在提供历史智慧、历史借鉴方面做文章。书修完后，要懂得开发利用，要懂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懂得走入寻常百姓家。我们的优势是掌握了全面系统权威的地情资料，守着这个宝藏不开发，那就是浪费资源。有为才有位，要有所作为，就得把地方志当大事业，打造智库，打造地情资料库，找专家学者概括总结出一些历史上的经验做法，对领导同志决策有所借鉴和启发。四是积极探索特色志、乡镇志的编纂经验。部门志、行业志、乡镇志要有与省市县志不同的地方，要好看、有可读性，能够让大家读进去。留住“乡愁”，就是要留得住历史的记忆。特色志、乡镇志印出来要大家都抢着看，就是成功的。五是要建成一支有奉献精神、奉献精神的队伍。地方志工作为天地立心，为历史立言，为民众立德，历史上的修志有这种气派。我们要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精神气，要坚守“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恪尽职守、锲而不舍、开拓进取”的修志人精神，要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培养有独立品格的修志队伍。

魏宏、钟勉肯定地方志工作

2015的1月24日，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志编委主任委员魏宏同志在《省志编委班子2014年工作总结及2015年工作打算》上批示：“志编工作很辛苦，抓得不错。”



2010年1月6日，魏宏（右三）来委视察工作



2014年1月24日，钟勉（右二）来委视察工作、慰问职工

2015年1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钟勉同志批示：“去年省志编委扎实开展依法修志工作，进一步加强基础和信息化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赞成2015年工作安排，望坚持重点突破，推进全面发展，推动地方志工作迈上新台阶”。

魏宏、钟勉同志的批示，是省委、省政府对全省地方志工作的肯定和鼓励，也是对全省地方志工作者的鞭策和要求。省志编委和全省地方志工

作部门、地方志工作者要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魏宏、钟勉同志要求，以对历史、对人民、对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记载历史、传承文明、资治育人，为四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本刊摘编）

勤勉实干成效显著 突出特色再创佳绩

——中指组领导充分寄望四川地方志工作

□ 黄 绚 刘艳平

1月22-23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方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冀祥德一行3人来到四川，在成都、绵阳等地围绕推动地方志工作向前迈进的成功做法，开展地方志工作尤其是第二轮修志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对地方志事业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的认识，对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2015年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内容，采取召开座谈会、实地调研、以会代训等方式，进行了为期2天的专题调研。

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钟勉委托，省政府副秘书长陈越良与冀祥德一行交流了情况和意见。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汇报了近年来四川地方志工作情况暨2015年的工作安排。成都市、绵阳市、南充市、省交通厅、中石油西南油气田等地区 and 部门的方志机构负责人围绕调研内容，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冀祥德对四川地方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四川



在省志编委召开“地方志工作调研座谈会”

是全国首轮修志工作的先进省、第二轮修志工作试点省，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工作成效显著，许多先进经验值得推广。一是领导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和主要领导对地方志工作抓得紧，指导实，措施有力。二是地方志工作队伍建设有思路、有章法、有成效，特别注重人才培养，通过下派锻炼、横向交流等方式，拓宽了干部培养途径，提高了干部素质，打牢了工作基础。三是工作扎实，成绩突出，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着重抓早、抓细、抓实，有开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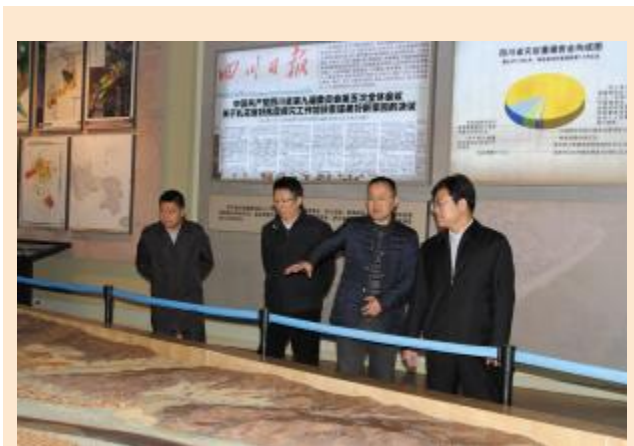
创新。四是法制化建设成效显著，着力打造依法修志工作格局，在全国率先进行地方志法规制定和修订，依法修志和志书编纂规范化工作领跑全国。五是工作有特色，既有全国地方志工作的共同特点，更有立足四川实际的自身特色，如脱胎于抗震救灾的“感恩文化”，在打造“红色文化”“巴蜀文化”品牌中融入方志文化元素等。六是迎难而上，凝神聚气，不断克服困难，发扬拼搏精神，取得新的成绩，勇攀事业高峰。

在北川的实地调研中，冀

祥德指出，汶川特大地震是一场世所罕见的巨大灾难，也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的豪迈壮歌，地方志工作要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特大地震灾害和抗震救灾工作，特别是要做好《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工作，为后人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要系统总结抗震的科学办法和救灾的实践经验，尽力避免人民群众在今后的灾害中受到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北川是大禹的故乡，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还是感恩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要充分挖掘历史资源，整合各种有效平台，加快申报“中国名镇志”“志书精品工程”等文化项目，为新北川的加快建设和长期繁荣发展多做贡献。

冀祥德介绍了中指组办公室近段时间的工作思路和重点工作，也对四川下一步的地方志工作提出了五点希望：一要认真总结经验，形成理性思考。要认真总结四川全省包括行业地方志工作的先进经验，争取在今年的全国经验交流会上发言。二要着力打造一批精品、特色工程，争取让四川地方志进入中国地方志首批精品工程行列。三要突出地方特色，打造四川品牌。既要努力使四川成为全国方志的著名品牌，又要把巴蜀文化中的方志元素不断做大。四要进一步注重人才培养，拓宽渠道，加强交流，可放眼全国，考虑纵、横向互派干部挂职、锻炼、交流。五要科学谋划、积极部署，为在四川建立全国地方志书专业出版基地分支机构做准备。

23日上午，冀祥德还就《中国名镇志》丛书入选要求、编写规范等作了专题讲座。来自省志编委及成都、宜宾、达州、眉山、甘孜等5个市（州）的26个乡镇及县（区）志办工作人员60余人参加了培训。



在北川调研



向北川地震罹难同胞致哀



冀祥德作《中国名镇志》编纂专题讲座

眺远梁山寺 感悟剑门关

□ 王少卿

剑门山，古称梁山，相传才华横溢、笃信佛教、与达摩有过“公案”的梁武帝萧衍，也曾在剑门山的大剑山绝顶舍身佛门。古刹梁山寺和梁武帝祠，依然矗立在剑门七十二峰的桃花峰与逍遥峰之间的舍身崖上。舍身崖海拔1180米，脚下便是落差数百米的悬崖绝壁。登临古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可感觉时空的聚敛，能领悟天地的浩然。放眼北望见长安，回眸南巡现蜀都。高耸于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之间，明察着秦陇巴蜀四方动静，便可洞悉熙熙而

来，攘攘而往。

时过亿年，沧海桑田。地壳运动，蜀地沉浮，周围隆起成山，中间积水成湖，在漫长而强烈的风化侵蚀作用下，山地为湖盆提供了丰富的沉积物，形成了四川盆地。“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蜀地的先民们在聚宝盆似的盆地里过着安静而封闭的生活。聚宝盆散发出富庶的浓香，激发了山外人的欲望。山外在觊觎，山内想坐享，在那原始和封建的世代，再没有比守望相助和开疆拓土更为辉煌的功绩了。这便注定了秦蜀之间的剑

门山不得清静。

剑门山脉横亘于四川盆地北缘，绵延数百里。山岭密布，沟壑交错；峻岭横空，连山绝险；群峰突兀，山涛云海。山脉北缘，陡然跌落，造就相对高差数百米的天险形胜，构筑了一道天然屏障。这屏障危乎高哉，气势恢宏，“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是天赐蜀地的护城墙。然而，觊觎的目光，越过高山窥视着盆地，搜寻到了屏障的缺口——关隘。

剑门山的关隘险绝。从昭化西北的天雄关起，北侧有白

卫岭、云台山、毛家寨、摩天岭、土地关。南侧有东山寨、剑门关、苦竹隘、小吊岩、研石寨、青强岭。古代多少人在这些关隘上攀爬行走，用尽心思，终究未能拓出大道通衢，依旧被李白描绘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畏途巉岩不可攀”的峡谷险隘。在这许多的关隘中，相对通畅，能以大队人马运送辎重粮草进出的，那便是蜚声古今的剑门关了。

据正史记载：剑门关位于大剑山中段，为东峰营盘嘴与西峰金城山之间的峡谷隘口。因两崖对峙，其峰如剑，其势如门，故曰“剑门”。两崖平地拔高150多米，顶部间距100多米，底部宽50多米，隘谷长500多米。大剑溪绕崖穿石，向北流出隘口，直泻而下。蜀汉丞相诸葛亮伐魏，于此立剑门关，设官戍守；唐代置剑门关，作为行政军事建制隶于剑州；宋代仍置剑门关，一度直隶京师，辖剑门县；元代废关置驿，明代复置关，清代废关置驿，至民国15年以前仍设驿站。历代官府多次在剑门关修建关楼，驻兵把守，昼启夜闭。

剑门关因其“秦蜀锁匙”的属性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特点，吸引了天下豪杰，前赴后继地来到这里，显

露他们解锁的智慧和破关的本领。

相传战国时期，秦惠王欲吞蜀地，苦于无路进兵，谎称赠五金牛、五美女给蜀王，蜀王派五丁力士，在剑门山劈山开通蜀道（称之金牛道，亦称石牛道，至今遗迹尚存），迎美女，运金牛进蜀，秦兵接踵而至，一举灭了蜀国。而史书记载的是：蜀王之弟苴侯在葭萌（今昭化镇）欲私立而取代蜀王，结交巴国而谋反，蜀王亲征，巴求救于秦，正中秦之下怀，秦遣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军从石牛道伐蜀，与蜀王战于葭萌，蜀王败走武阳（今彭山县）被擒，蜀灭，秦遂攻取了巴国。这故事是蜀地被中原统一的开始，也给剑门关的历史涂抹了最早的底色。无论是传说还是史记，都告诫了一个真理：贪婪金钱美女和放纵私欲内讧，必是自取灭亡。

争夺有了开头就很难煞尾。最为丰盛的文字记载，当属三国时期的事与情。刘璋请刘备入蜀的初衷是共击汉中张鲁，而刘备入蜀不久便取而代之，并在剑门关设县立关，以其为中心，加强了汉中到成都一千多里的节节把守，朝思暮想从这条道路走出去恢复汉室。这故事告诉人们，燕雀安

知鸿鹄之志，小经营驾驭不了大志向，请神必先考虑送神的计策。人们很难理解，神机妙算、无所不能的诸葛亮，可以在剑门关“凿石驾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行旅”，怎么就没把钟会牵制剑门关，邓艾偷越阴平古道灭蜀的预测锦囊遗留给姜维呢。看来，这险关也具有欺骗和麻痹性，提醒人们：对某一个体的全然依赖，将会导致许多的漏洞缺口。

悠悠历史，给剑门关覆盖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神奇，遗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彩。前秦时期，秦王苻坚也青睐上成都，唯剑门关久攻不下，后采用姚萇诈降计谋巧夺成功。唐朝末年，“随驾五都”之一的王建，忠心护驾获取了皇帝的信任而进入蜀地，他在得到剑门关这一地利之后，立即切断秦蜀通道，也在成都登基称帝。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军在剑门关进行了多次战争，虽然占据了剑门关，但后援不济，便做了损毁之事无功而返。北宋时期，王全斌迂回包抄、奇特用兵夺取了剑门关，使蜀降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在蜀中初具规模，但因剑门关失守，起义大业中途坍塌。宋末元初，元宪宗蒙哥在剑门关一带亲自指挥了一系列战争，显示了元代帝王的骁勇善战，特别是剑

门关激烈而悲壮的争夺，也铭刻了宋朝张实、赵仲等忠叛两样人物的面孔。1935年，红军借道剑门关北上抗日，走的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康庄大道，虽经浴血奋战，自然是没有过不去的关隘。

剑门雄关，历经沧桑，见证了王朝更替，造就了帝王英豪，也成为万千灵魂的永久驻地。关口附近有姜维城遗址、姜平襄祠、姜维墓、剑溪桥、志公寺等古迹。还有一系列历史风云事件及其人物的雕塑石刻。关之左右山巅有梁山古寺、玉女台、经皇洞及翠屏峰、舍身崖、仙女桥、仙峰观等名胜。当然，也存储了不少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感悟兴叹的诗文、题记、墨迹。峰谷崖壁、古树枯藤在风霜雨雪、阳光云雾的掩映下，交相演绎，变化无穷，呈现出一幕幕神奇的幻境；“飞湍瀑流争喧豗”，鸣禽走兽相呼应，似乎是山魂情绪的传达，只可意会，无法

言传。藤蔓似乎修炼成精，升华为木本，嬗变为人们的手杖而四方云游。那苍劲的纹路，凝结了古老的坚韧，持他伴行，没有跨越不过的艰险。

千百年来的史官和文人，象悟禅一样，祈求以最精简的文字道尽剑门关上的神秘因果，然而，今非古犹如“子非鱼”，神圣，岂是凡人可以破译解码的，而文人偏偏具有“究天人之际”的固执。想起李白劝慰试图攀登蜀道的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这规劝似乎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剑门，是中国东西南北的一个重要结点，在秦陇巴蜀的中间拔地而起，挺身而出，融通着相距万里的美好，仲裁着盘根错节的是非，庄严肃穆地履行着他的职责。如果仅对剑门“身躯”进行赞美，那将会降低了他的境界，贬低了他的价值，淡化了他的意义，他便黯然失色。明确他的象位，彰

显他的功勋，更能激发他的潜能。当今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洗却了攻城略地的妄念。古代独立、割据的蜀国已经变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个省份——四川，盆地意识，已被共同的中国梦彻底替换。剑门关与时俱进，已由“锁匙”变为通衢：途经剑门关的成都至宝鸡的铁路复线早已畅通；北京至昆明、兰州至海口两条国家级高速公路在剑门山下交汇；兰州至重庆的铁路、西安至成都的高速铁路正在紧张的修建；盘龙机场与多个城市开通了航线；港口建设紧张进行，将通航重庆直抵上海。水陆空的立体交通网络已经形成，已是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这条条通道，象血脉，为“东方巨人”输送着血液。四川永远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剑门山也将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履行崭新的职责，巍然挺立，确保祖国的有机联系，四通八达。



崖前千佛客参禅

□ 伊国华

佛教入川，广元是第一站，广元精美绝伦的佛教石窟造像首推千佛崖。

公元514年，佛教已经进入广元，并雕刻了许多佛像。1983年4月，广元城关豫剧团建筑工地出土了一批佛像，佛像大多残损，身形瘦削，上身较长，整体风格颇有北魏“秀骨清像”之风。其中一尊释迦文佛背面刻有“延昌三年”题记，延昌是北魏宣武帝年号，延昌三年即514年。

200年后的唐开元二年（714），太子左庶子韦抗接到唐玄宗上谕，命他即日赴益州出任剑南道按察使、大都督府长史。韦抗从长安赴汉中，沿嘉陵江驿道入蜀，进入利州赴任。来利州第二年，韦抗找来

一个石匠，在千佛崖开龕凿像，一个3米多高的马蹄形洞窟，佛祖端坐中央，南北两壁雕满了观音，窟壁上密密麻麻排列着历代题记。人们习惯上把这个洞窟称为韦抗窟。韦抗窟最早的题记为开元十年（722）：“剑南道按察使银青光禄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韦抗功德”。藏佛洞题记更早：“大唐开元三年，剑南道按察使、银青光禄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西万年县韦抗，凿石为路并凿千佛功德。”这是迄今千佛崖能找到的最早题记，韦抗窟普遍被认为是千佛崖最早开凿的石窟。

唐开元八年（720），苏颋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他为官清正，礼贤下士，历高宗、

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威望极高。苏颋由长安入蜀路过千佛崖时，写下了《利州北佛龕记》：“吾见夫山连岷山蟠，水合江沱，山兮水兮，路穷险耶，南望兮此多情。吾观法像住世于岩之阿，千百万亿兮相观我，载琢载追兮吾匪他……”，并捐资雕凿石窟。第二年，他巡行到利州，石窟已经完工，苏颋大喜，又写下《利州北佛龕前重于去年题处作》：“重岩载清美，分塔起层标。蜀守经途处，巴人做礼朝。”苏颋捐资的石窟保存至今，石窟不大，雕有一佛二菩萨。

公元733年，武则天代唐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当皇帝的理论依据来自佛家经典《大云经》：

“佛告净光天女言，天女将化菩萨，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武则天登基后下令天下广建“大云寺”、广布《大云经》。广元是武则天的出生地，于是广元子民在千佛崖边建造了为武则天歌功颂德的“大云寺”，在千佛崖上开窟造像了“大云古洞”和“释迦多宝窟”。有很多专家认为，“多宝窟”内的“持莲观音”像就是依照武则天青春年华时的妩媚容止艺术化地创造出来的。“持莲观音”造像高1.35米、肩宽0.3米，宝冠束发，绣缯披肩，着绣衫贴体长裙，双臂赤裸，双手一上一下持握着两只莲茎，娉婷优雅地立于盛放的莲台之上；造像眉眼细长，鼻子小巧玲珑，嘴角微微上翘，侧首、低眉、含笑，生动传神，媚态极妍，嘴角流露出一丝羞涩微笑，堪称千佛崖石窟艺术精品中的神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美学大师王朝闻参观“持莲观音”像后大加赞誉，称其为完全可以与古希腊雕像断臂维纳斯比肩的“东方美神”。据说，千年以上“持莲观音”像迄今为止在全世界仅发现两尊，一尊就是千佛崖多宝窟的唐代持莲观音像，另一尊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入藏，是1915年一个日本人从西安附近的“古石佛寺”盗运出境的。

四川是道教发源地，广元更是道教的繁盛之地，也是巴

蜀文化、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之地。佛教信众为了宣传佛法无边，为了展示千佛崖佛像的精美，吸引更多人信佛，又衍生出“谁数清了千佛崖的佛像，谁就会得到嘉陵江中升出的金船”的传说，传说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参佛。由此，佛教在广元不断发展演变，与巴蜀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文化。千佛崖第7窟大佛窟的大佛，方脸浓眉，鼻梁粗大，模样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国南方人，而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这尊大佛的风格，恰恰验证了广元就是各种文化的交汇之处。

1961年，千佛崖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佛崖石窟造像群全长380多米，在西高东低的岩壁上见缝插针一般地凿满石窟，每个石窟内都雕刻着众多佛像，有的佛像就在路边的石窟里，有的在岩壁84米之处的石窟里，最密处的石窟上下有13层，石窟如同佛塔一般层层罗列直达山巅，气势恢宏。千佛崖现存石窟873窟，造像7000余尊，比清人的记载少了整整1万尊。1935年，国民政府修川陕公路，曾将千佛崖南段一部分石窟炸毁，更有专家学者认为千佛崖被毁石窟超过了大半。2008年地震后，广元市委、市政府投资4.8亿元，



持莲观音

把千佛崖景区列为集文物保护、道路交通、人居环境、经营项目、休闲娱乐五大功能于一体的灾后重建重点工程、城乡统筹的示范工程、改善民生的民心工程，实施千佛崖前108国道改线工程、开凿680米隧道、拆迁保护区范围内的部分违章修建的城乡居民住房、改造保护区内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沿线风貌、文物本体病害治理和建设保护性建筑等工程项目。2011年10月12日启动对千佛崖摩崖石刻造像进行病害治理和龛窟修复的第一期保护工程，2012年1月18日，千佛崖景区重新开园迎客，经过发掘，清理出明清时期的古蜀道石板路、清代石栏桥、栈孔、明代石雕罗汉像20余尊，损毁的唐代佛像以及清代碑刻又重新与游人见面。



昭化与丁宝桢

□ 杨大明

昭化，古称葭萌，白龙江与嘉陵江在这里汇流，河谷两岸形成肥美的冲积坝子。这里地处水陆交通要冲，也是川、陕、甘边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到了昭化，不想爹妈”的口碑，在巴蜀大地早已四处流传。

昭化古城承载和见证着数千年巴蜀文明的演进。2014年，考古人员在昭化城北摆晏坝发现了一座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古城址，其年代为西周时期。这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城址，也是四川先秦时期考古继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极有可能就是继三星堆之后的蜀国第二

城。战国时期，昭化城西北的土基坝，是古蜀国直侯的都邑，名吐费城。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灭蜀，顺势吞并巴、苴，在原直侯领地置葭萌县。从此直至1959年昭化县并入广元县，两千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历代县级以上地方政权的治地。在西汉时期，昭化城已经非常繁荣。公元212年，刘备率兵屯驻葭萌，“厚树恩德，广收众心”，以葭萌为根据地于214年攻取成都。217年，刘备改葭萌为汉寿县。252年，蜀汉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奉命在汉寿开府，执掌蜀国军政大事。城周古驿道、葭萌关、费祎墓、牛头山、鲍三娘（关索

之妻）墓、司马口等三国遗迹风貌尤存。从西周至蜀汉，称昭化为“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其实不虚。

历史的风烟，尘蔽了昭化太多的过往。无数的历史过客中，也有人让昭化本地人至今不忘。在昭化古城，问起武侯（诸葛亮）祠、敬侯（费祎）祠，许多人已不知其所以，但说起丁公祠，妇孺皆知。丁公祠，由昭化士民筹款3400余钏，于光绪四年（1879）在西门外武侯祠废墟上建成，供奉的是时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及其祖父丁必荣。每年4月28日丁宝桢生日，昭化都要在丁公祠举办庙会，附近百里乡民赶

会、祭祀、看戏，热闹非凡。

丁宝楨，贵州平远（织金县）人。其祖父丁必荣曾于1817年任昭化知县，清正爱民，深受百姓拥戴。1876年，丁宝楨由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丁宝楨在世时能被昭化百姓立生祠享祀，是因为他捐金置产永免昭化民间夫马（旧时官员出行所用夫役、轿、马等的合称）经费，使昭化百姓得到大实惠。现立于昭化旧县衙旁，由昭化知县敖立榜撰写的一通“丁宫保捐廉置产为昭化夫马经费永免派民章程序”碑记述了其事。碑文前半部分大意为：昭化地当驿道要冲，每日办理各种公差的官员络绎不绝，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流差”。这些官员过往昭化，所有夫马经费都需要昭化穷苦百姓按原有粮赋额外摊派税收，成为昭化普通百姓和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虽然丁宝楨总督四川后决定裁撤全省夫马，但昭化毕竟是交通要道，尽管有

所减免，负担依然沉重。丁宝楨途经昭化，了解百姓疾苦，怦然心动，特为昭化捐银7000两，又派专人会同昭化知县敖立榜，商劝昭化殷实富户再捐3000，在昭化置买田产，每年收取租息，专门支应一切夫马经费。长期以来陷老百姓和地方政府于困境的夫马经费得以永免。昭化士民为感恩而立丁公祠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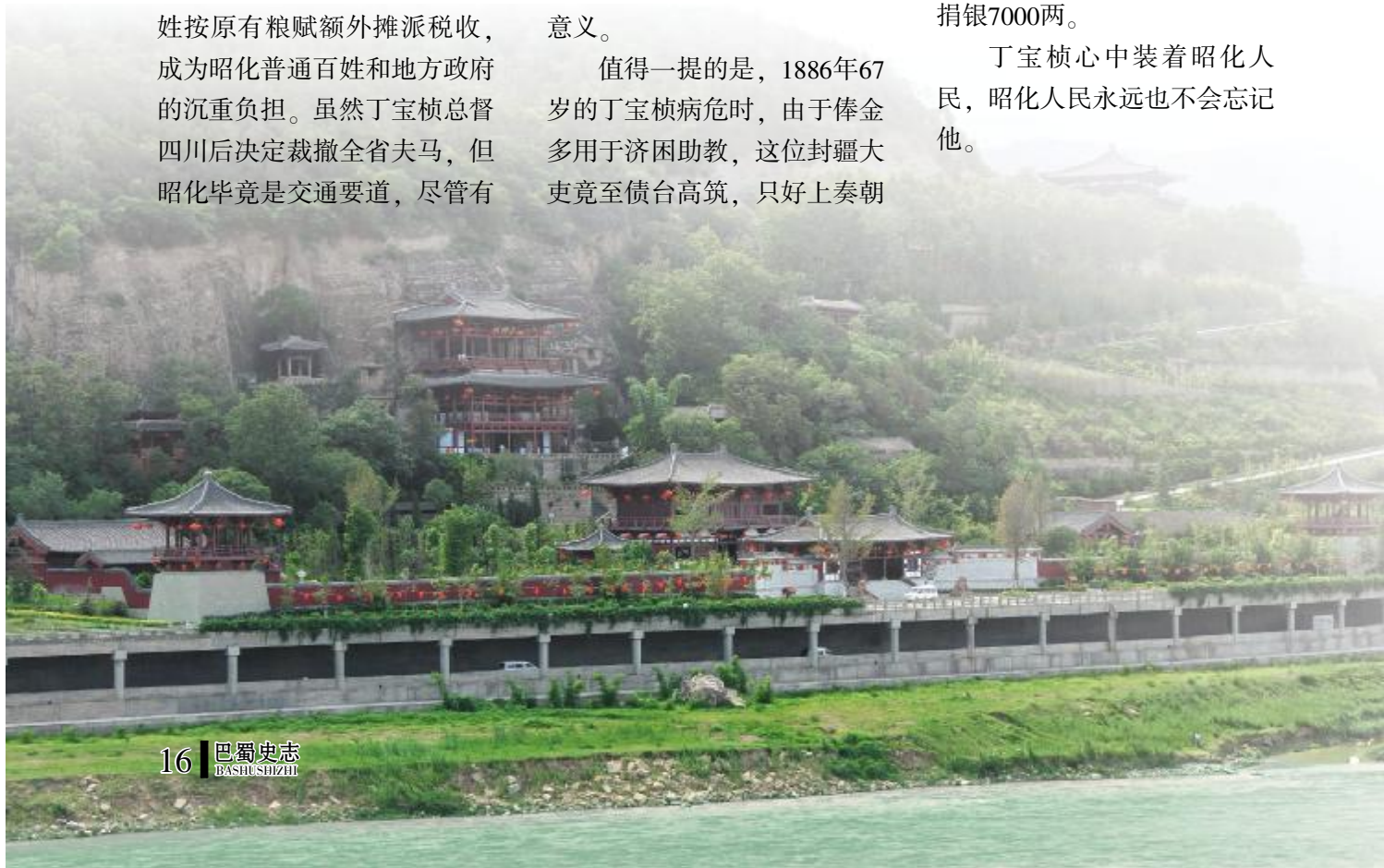
碑文后半部分的五条章程规定了租息的收支制度、管理程序、监督办法、责任追究等，体现了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直到今天，对于我们反腐倡廉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1886年67岁的丁宝楨病危时，由于俸金多用于济困助教，这位封疆大吏竟至债台高筑，只好上奏朝



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衔环以报”，丧归时，赖僚属集资才得以成行，以至光绪皇帝动容。也许在他所借之银中，就含昭化的捐银7000两。

丁宝楨心中装着昭化人民，昭化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



四川省旧志整理出版与利用情况述略

□ 马小彬 朱丹

四川旧志资源概况

四川志书编纂历史源远流长，自东晋即有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市）人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志”为书名的史地典籍，也是现今尚能完整保存下来的记载四川及其周围地域形势等最早的一部书。此后历经无数次修志活动，累计修成千余种旧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志书8246种，按地域统计，其数量以四川为最多，仅在清代四川所修各类志书即达400多部。另据《四川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四川旧志现存约620种（不含重庆市所辖地区），四川省方志馆馆藏旧志400余种，约占50%。

总的说来，四川旧志资源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跨度时间长。《华阳国志》因初具后世方志规制，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最古的方志”。汉晋以降迄民国时期，一大批志书纷纷涌现。二是体量大。自汉至宋代的四川各种方志类著作约290种，元代3部，明代22部，清代477种，民国164种，总计约900余种，总量居全国之首。而清代

及民国时期，四川各地编修志书的数量也分别居同时期全国之首。三是地域广。《华阳国志》所载内容，不仅限于四川，还包括了今重庆绝大部分地区和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部分地区。民国时所修志书，也包含了今重庆和西藏部分地区的内容。四是质量较高。常璩《华阳国志》体例融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于一体，为后世方志编纂起了指导性作用。萧梁时期李膺《益州记》主要记述益州地区地理、掌故，影响较大。明正德时期熊相纂《四川总志》37卷，开总志编纂之先河。清嘉庆《四川通志》篇幅较大、内容丰富、体例完善，影响深远。清代段玉裁、李芝合纂乾隆《富顺县志》，张珽修、侯国栋等合纂乾隆《汉州志》，李调元所纂嘉庆《罗江县志》等皆名噪一时，成为后世方志纂修的典范之作。

因种种历史原因，目前四川现存明清至民国时期旧志约600多种，其中约20%散存在省外，少数甚至仅存于海外。在省内的也分散在各大学图书

馆、公共图书馆以及社科研究机构图书馆，许多仍以手抄本、稿本或胶卷的形式存在，孤本甚至残本不在少数。就种类卷帙而言，以清代为最，民国、明代次之。以地域而言，以成都、绵阳、内江、乐山地区较多，川西如西昌、攀枝花、甘孜、阿坝、雅安一带则较少。个别偏僻地区，如普格县，则从未修纂志乘。

纵观四川旧志资源整体情况，虽数量较大，但版本、收藏等情况较为复杂。如不及时进行抢救和整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旧志将会逐步散失甚至湮灭，必将给历史文化传承发展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抢救保护和搜集整理旧志资源刻不容缓。

四川旧志整理出版与利用情况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地方志编纂工作以来，在完成新修地方志书之余，四川各地志办对少数价值较高的旧志进行了标点、注释、校订和翻译工作，总计数十种。但限于资金和水平，多数系内部铅印，出版水平不高，甚至错讹之处甚

多。又由于无系统规划，必然呈现零散、无系统性的缺陷。2009年，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志编委”）正式组织实施旧志的抢救保护和整理开发工作。

（一）四川旧志整理出版情况

2009年初，省志编委下发《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开展旧志普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当年6月完成省内收藏四川旧志的普查，以便准确把握旧志保存保护现状。同时，起草《四川省旧志整理工作方案》，提出全省开展旧志整理的指导思想、任务和整理标准、工作目标、方法步骤，组织、人员、经费的保障等。一是开展旧志普查，摸清家底，并做好登记、建立数据库和保护技术培训等工作。二是先后制定《全省旧志抢救保护整理出版规范》《旧志数字化处理及

数据库建设规范》等规范，指导工作开展。三是积极组织有关单位专家学者有计划、分步骤、有重点、分期分批次地开展缩微影印、版本著录、鉴定、定级、数字化处理等工作，建立全省旧志目录及全文数据库。四是开发旧志资源，加强旧志出版工作。

四川省委、省政府对此非常重视。2010年，省政府办公厅公布第一批四川省珍贵古籍名录，要求各地政府、各部门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在这批名录中，包括有近20余部志书。2010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书》，其史部拟目也将方志类作为一个重要栏目。

经过几年努力，四川旧志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发行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2011年4月，《四川历代旧志目录》（内部刊印）编纂出版，为下一步旧志整理工作打下了基础。2012年12月《四川历代旧志提要》正式出版。目前，《四川历代旧志集成》（第一辑、第二辑）即将正式影印出版；《西康通志稿》也已完成点校工作。

（二）四川旧志的利用情况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许逊《曲沃志叙》中说：“今之志，古之史也。俗风观于斯，政治污隆具于斯，学校、人文关于斯，赋役备于斯，疆域、封守、山川、物产载于斯。故观志者，可以知土地之宜，可以识时务之趋，可以设教，可以崇化，可以通变以宜民……”可见，志书的价值，远非只是“存史”，还有着它独特的“资政、教化”等经世致用的时代价值。

近年来，随着四川历代旧志整理工作的逐步推进，旧志的价值也不断得到体现。例如，北川地区自古便是羌汉聚居区，《北川县志》载：开坪牛王庙碑记有羌·汉原以治城卷洞桥为界，“桥北概系羌番”之说。羌汉两种形式建筑的规模在历史上的北川，是大体相当而且长期并存的。“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北川等羌族地区灾后重建的重点就在于如何



让民族地区的建筑文化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又适应现代人生活的需求；如何在传统文化几近丧失殆尽的环境中，实现民族传统的回归……一部《北川县志》，启迪了今人的智慧，也激发了今人的创造力。

《四川历代旧志提要》的价值

《四川历代旧志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共50余万字，收录明清两代、民国时期四川(含重庆)旧志六百余种，收录时限上起明正德十三年(1518)，下迄1949年12月，范围包括国内外现存四川省历代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乡镇志、卫所志等。另具有方志初稿性质的志稿、采访册、调查记等资料也在《提要》著录范围内。《提要》按照其历史本来面貌，收录四川以及现属于重庆市的各市县方志。每部旧志提要按目录学要求，用精确、简明文字介绍方志概貌，并注明版本收藏情况。

《提要》具有开创意义地、首次全面系统总结了四川历代方志成就，填补了省内地方文化研究空白，弥补了海内外有关四川方志目录本籍收录不全、遗漏多、精审不够、著录要素不齐等缺憾，有不少突破和创新之处：

全面性。凡属明清以来的



四川地方志(包括孤本、手抄本)，凡能搜罗的或知其大略的，都编写提要，不以版本优劣妄加取舍。故《提要》所录四川历代旧志比较齐全。

客观性。每部方志的作者署名一律从所据版本。提要力求忠实原作，客观介绍编纂过程，尽量引用序跋原文，并指出方志中所存的罕见史料，著名方志或珍稀方志标列全书纲目。这种保持原生态性的史料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准确性。本书所用材料，基本为第一手，对不得不利用的第二手资料，则作认真考订。有的方志作者、编纂过程、版本流传情况是据大量史料考证而来，实属具有可靠性创造。

科学性。从编集体例、自然资源、经济特点、社会风俗、著名人物、罕见材料等方面对全书内容作介绍，并对每部地方志的得失、版本优劣、

历史地位作评述。

实用性。作为工具书，为便于翻检，书末附有《四川历代旧志书名索引》《纂修人姓名索引》。

《提要》清晰系统地展现了四川地方志发展历史脉络，为地方志和地方史的研究与教学提供了翔实珍贵的史料，不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促进四川旧志的整理保护和开发利用，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①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②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
- ③嘉靖《曲沃志叙》，《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册，262—263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辉煌成果下的思考

——四川省第二轮三级志书编修若干问题的反思

□ 钟再原

四川作为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试点省之一，历时10多年已基本结束修志工作。此轮修志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辉煌的成果，但还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和遗憾。剖析这些问题，对下一轮修志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

篇目设置 志书的框架由卷首、正文（专志）、卷尾（附录）三大部分组成，根据篇幅长短有大、中、小篇之分。从断限年代来看，除少数上限至清代或民国时期外，绝大多数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段。市、县级志书大都系小篇结构，但因断限年代长短不一，正文篇幅容量存在差异，志书设置的篇目也就不一样了，绝大部分志书沿袭了篇章体，仅少数地方尝试了条目体。篇目设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横排门类的问题 一是不规范。尤其在横排部类（俗称大类），如政治与经济部类的排列先后极不统一。笔者认为，应按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规定，规范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部类的顺序排列。

二是不科学。这主要表现在部类之下的门类横排方面，如经济部类之下几大产业的排列，有的志书把农业排在工业之后。我国对国民经济的科学定位是，第一产业为农业，第二产业为工业，第三产业为商贸。不能因为一个地方工业产值占GDP比重大，取得的经济效益显著，就排在农业之前。但个别不涉及农业或牵涉面小的应除外，如成都、重庆主城区的行政区。

三是不合理。第二轮修志中很多志书十分注重突出地方特色，通过设置专篇专章或专题记事等集中记述，并都把这些篇目置于政治、经济等部类之前彰显其重要。但这些篇目反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应按照“事为类聚”和“相近相邻”排列较为合理，即将这些篇目置于相同或相近门类，为了突出可排在该门类之首。

四是差异大。无论是各部类之下门类设置的多少，还是其相互之间的篇幅文字，差距很大。如社会部类，从篇章体志书横排的篇目看，有的仅

设1-2篇，其篇幅文字最少；而反映经济、政治部类篇目最多，据统计，经济部类均在10篇以上，篇幅文字位居榜首。这中间既有各部类记述的历史内容容量大小的客观原因，也存在归类不当的问题。如有的志书把人口、环保、民政等篇置于社会部类之外，大都放置在建置沿革和地情部类之中，这些归类的差异导致了各部类之间篇目和文字的悬殊。

篇章体与条目体的问题 从第二轮志书框架结构看，绝大部分沿袭了篇章体，少数地方创新和尝试了条目体。在肯定这种体例创新的同时，要看到客观上还存在志书框架结构松散，设置条目类型层次及大小随意性很大，条目标题确定与记述内容把握不够准确，不少门类中既有篇章体设置又有条目体设置显得不十分严谨等不足。

第一，无成熟可借鉴的作品。如条目的类型层次及大小、条目设置数量的多少、条目标题确定及方式、内容相近条目之间的关系、条目的撰写方法与志书合成总纂，以及质

量监控等，无论从修志理论还是实践都是陌生的。

第二，条目设置与层次结构的问题。一是条目设置随意性大，如有的在政治部类中，第二个层次设“中共”门类，到第四个层次才出现设置“宣传”“组织”“统战”等部门的条目，并分别只有1个条目；而在经济部类中，第二个层次应该分别是一、二、三产业的门类，但不少志书把邮电通讯提升为门类，与“中共”层次并列，出现了“小灵通”“一线通”“天地通”等条目，与中共的“宣传”“组织”“统战”等条目并列。从结构上看，二者并列设置无论是层次还是条目大小都很随意。二是在一个门类、单位、行业的条目之首，以篇章节体的方式设置了概述、综述等，其目的是为后面各条目的内容铺垫。但这些概述、综述没有设置条目框入，如果要设，势必造成全志雷同，如果不设又难以检索。三是在一个条目之前，有的写有无题小序，文字少的仅20多字。四是在条目下面出现以“黑体字”的方式来分段落。如在“经济发展”条目中以“黑体字”来分段设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类似情况随处可见。

第三，条目的篇幅差异十分突出。如一部区志，最长的一个条目长达6000多字，最短

的40多个字。

卷首与卷尾的问题 在卷首方面，一是设置专题记事的志书不多。一部志书，通过提炼升华这个地区最具影响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形成若干个专题记事置于卷首，能彰显其地方特色，具有较强的资政性和可读性。二是图片设置不“精当”。已出志书的前置图片大部分存在“三重三轻”的现象。即：重领导图片，重城市建设图片，重风景名胜图片；轻农业图片，轻图片内涵，轻图片质量。

在卷尾（即附录）方面，一是篇幅内容比重小，很多志书没有达到附录文字要占全书文字的10%左右的标准，一些具有存史价值的资料未录入。二是随意性很大，如反映地区文化氛围的墨宝诗赋、绘画摄影等作品，很多志书没有录入。三是有的志书未设置索引，有的设置了但内容不全，影响了读志用志。

编纂内容 第二轮志书总体质量不错，但精品名著不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志书撰稿质量和编纂水平存在不足。

两轮志书“焊接”不好 第二轮志书编修的都是断代志，除少数新修外，绝大多数为续修志。续修志的基本模式为“续、凝、补、勘”，其中的“续”“凝”就是对上轮志书凝固的历史下限，与这轮志书的历史起点进行“焊接”，使

两轮志书的终点与起点实现无缝对接。但一方面有的志书记述历史与上轮志书没有追溯衔接，各篇、章、节、目大都以“某年（上限）以来……”一刀切后，就开始叙述历史。加之综述、概述缺少，导致对记述的历史发生、发展、现状不清楚。另一方面有的志书虽然追溯了上轮志书历史，但由于对那段历史理解不透，资料取舍不当，追溯历史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等关键要素把握不好，致使两轮志书的历史不能有机衔接，形成明显的痕迹或断层，缺乏完整性。同时，有的志书大事记与正文（专志）的下限时间不一致，这将为下轮修志衔接带来影响。

撰写内容质量不高 一是大事记的记述。通过对多部志书归类分析，大事记内容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即政治类的大事记多，其它类的少，一般工作的大事记多，重要工作的大事记少；有关地方志工作的大事记多，其它部门的少，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

二是改革开放的记述。第二轮修志记述历史的时代特征是改革开放。通过剖析多部志书，无论是设置专篇、章、节来集中记述改革开放，还是随各篇、章、节记述，以及集中与交叉相结合的方式都普遍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内容缺

失，在政治类缺失政治体制改革的记述；在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类，缺失部门、行业、系统的改革；在文化类缺失文化、教育、科技、广播电视等部门、行业、系统的体制改革；在其它方面缺失对外开放、民生保障等体制的改革。二是轻改革开放内容的记述，既未浓墨重彩记述改革开放内容，又未全面准确勾勒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彰显不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三是其它门类的记述。在自然方面，缺失气象物候、植被演替等内容；在政治类，党委政府的政法、财贸、体改委（办）等方面的工作缺失；在经济类，一、二、三产业记述内容缺失或薄弱。

四是供稿基础未夯实。志书撰写一般以目或子目为一竖写单元，记述单元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基本要素不齐全，记述一件历史的时间、地点、前因后果，事物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尤其是重要转折的拐点没有交待清楚，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链条和故事；二是记述内容重点不突出，地方特色不突出，史实把握不准确；三是各单元供稿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志书整体质量。

志书纂稿存在不足 一是修志主编难觅。主编对一部志书担负着主导、主攻、主力作用。其理论水平、社会阅力、知识结构、写作水平、协作能

力等等是志书质量的关键之一。

二是主编把关不严。主编对一部志书应把好单位供稿质量关、分纂志稿合格关、合成总纂达标关。为确保各关口的质量，主编要与编辑部人员提前介入到各供稿单位，通过座谈、评议、自审，反复修改完善达到质量标准后才允许进入编辑部。要重视各部类志稿的分纂，事先分别选定熟悉地情类、政治类、经济类（分一、二、三产业）、文化和社会类的责任编辑；在总纂关口要融会贯通全志，严把史实、保密、政治关。

三是体裁文风缺陷。志书体裁主要指志、记、传、图、表、录、考等，以志为主体。志书的文风是指修志规范要求的语言文字。主编统纂就是要消除全志体裁文风与志书相悖的问题，真正实现一枝笔杀青成书之目的。目前，主编统稿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不统一规范。如数量单位混乱，口头语言用于志书中，记叙数据不准确等等。二是方志独特的体例文风彰显不够。坚持述而不论，却忽视了必要的文理通顺、文辞优美、文笔流利等等。三是形式单一，生硬呆板。缺少必要的图、表，体现不了志书的图文并茂。

组织实施 在前期准备、组织管理、措施和方法、善后工作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前期准备不充分 一是调查研究和集思广益不够；二是启动修志的条件准备不充分，修志经费、人员，以及领导力量等措施与修志工作不相适应；三是设置的篇目框架不够成熟，波动较大，影响了修志进度和质量。

修志措施不给力 一是主管领导变化频繁，工作出现断档和松散现象；二是领导、监督、指导不给力。志书是“官书、官修、官责”，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持、政协参与的修志工作格局在实际修志工作中没有具体化、规范化，未能真正落到实处。

志书出版不规范 一是装帧设计水平不高；二是出版社审查不严格；三是印制装帧质量差。

善后工作不够重视 一是勘误工作。按规定，公开出版物发行之前，要再一次对其作品进行勘误，并将勘误表放入书中，对读者和社会负责。二是资料归档。按照国家档案、保密等法规，修志原始资料要加以整理、分类、归卷存档，但这项工作很多地方忽视了，导致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散落、流失。三是开发利用，由于各种原因，方志馆（室）建设难以纳入统一的国家立项规划，地方志开发利用工作严重滞后。

（作者单位：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绵阳抗震救灾志编纂研究

□ 余正道 晏茂川 李维怡 伍丹丹

编纂目的、意义及编纂原则

《汶川特大地震绵阳抗震救灾志》(以下简称《绵阳抗震救灾志》)是绵阳历史上第一部针对一场突发特大自然灾害(8.0级特大地震)而编纂的志书,是一部全方位记述和反映地震灾情、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的专志,通过全面客观地记述绵阳受灾情况、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对系统总结抗震救灾经验、加强灾害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高防灾减灾工作水平,对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激发全市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信心和决心,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加快建设西部经济文化生态强市,加快建设绵阳科技城,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编纂《绵阳抗震救灾志》的实践中,必须牢牢把握四条编纂原则,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把握政治原则,处理好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与存真求实、客观记述的关系;二是把握群众原则,处理好充分记述地方党政组织领导作用及客观反映普通民众自觉投身抗震救灾的关系;三是把握保密原则,处理好保密与如实反

映历史的关系;四是把握真实可用原则,处理好资料来源多元化的关系。

编纂具体问题及处理方式

编纂抗震救灾志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没有先例和经验可以借鉴,在编纂实战中将坚持编纂基本原则和勇于创新突破相统一。

上下限问题及处理方式 《绵阳抗震救灾志》编纂方案最初设计的上下限时间为:2008年5月12日至2010年12月31日,也就是从地震发生到灾后重建基本完成。后来在编纂实践中,为全面反映三年灾后重建的情况,将下限延至2011年9月30日,即灾后重建全面完成时间。

具体到各篇分两种情况:一是灾情篇、抢险救灾篇、医疗防疫篇、赈灾篇的上下限原则上为2008年5月12日到2009年5月12日。这种断限,与省上的2008年5月12日到2008年11月19日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撤销的断限略有不同,原因是绵阳灾情特别重大,次生灾害频发,抢险救灾难度大,医疗防疫后续任务艰巨,赈灾规模和难度超乎想象,如果仅记述到2008年11月19日止,很难反映事件的全貌,因此,决定

把以上4篇的下限延至2009年5月12日。同时，我们对灾情篇的上限做了适当上延，因震前的地质、水文、自然、气候、人口等情况需要记载，震前绵阳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需要交代，历史上绵阳境内地震发生和监测情况也需要简述，应该追溯到地震发生前。

二是概述·大事记、灾后重建篇、人物篇、附录篇的上下限为2008年5月12日至2011年9月30日，下限比省上的规定延长了9个月时间，主要是考虑到绵阳灾后重建工程浩大的具体情况，适当延长下限，可以保证内容的相对完整。如英模（先进）集体与人物篇，不仅记载了抗震救灾英模集体和个人，还把灾后重建先进集体和个人收了进来，其中包括对口援建先进典型；灾后重建篇下限延长后，就可以不漏记不缺项，避免因人为割裂造成本志的历史遗憾。

越境而书问题和具体处理 传统志书通常将“越境而书”作为大忌。但《绵阳抗震救灾志》作为记录和反映与绵阳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密切相关的各项内容的专志，又有其特殊性。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是全国性的大战略，政策和法规令出中央、省、市，援助来自社会各界、全国各地，很多事件并没有发生在绵阳境内，但直接影响着绵阳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因此，有必要“越境而书”。凡是与绵阳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相关，不管发生地在哪里，都要大胆纳入资料收集范围。

部分内容的特殊处理 一是“升格处理”。对在绵阳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出现的一些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的典型事件和现象，如北川县城惨重损失、九洲体育馆和南河体育中心两个规模巨大的灾民临时安置点、唐家山堰塞湖排险避险、北川中学救援、八一帐篷学校开设、北川新县城选址重建等都做了升格处理，或由目变节，或由节变章，作为全志的重点、亮点凸显出来。在灾情篇，除设计了“灾情概况”一章，还设计了“极重灾城镇灾情”章。

“灾情概况”章，下设4节，将极重灾县北川县、安县和平武县分别作为第一、第二和第三节，江油市、涪城区等6个重灾县的灾情则放在第四节综合反映。在“极重灾城镇灾情”章中，则用3个节的篇幅对北川、安县、平武3个极重灾县境内的北川县城、擂鼓镇、陈家坝乡、高川乡、茶坪乡、晓坝镇、平通镇、南坝镇等8个极重灾城镇的灾情进行记述。在唐家山堰塞湖排险避险上，由于唐家山堰塞湖危害最大，其排险除险工程牵动全国，是绵阳乃至全省抗震救灾工作中的一项特别重大、成功的工程，因此将其单独作为一章，用了两节十个目进行详细记述。在受灾群众临时安置上，专设一章，下分九洲体育馆、南河体育中心、总装八一帐篷学校、县市区临时安置点，详细记述了灾民临时安置的组织协调、应急安置、物资保障、服务管理、医疗防疫、临时就学等方面的内容。

二是附录的灵活运用。除在卷尾专设“附录”一篇外，在正文中也大胆使用篇末附或章末附，选取一些有特殊价值和典型意义的原始文献、新闻报道、口述资料或案例，作为正文的补充。如受灾群众心理危机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但在正文中很难用清晰的文字予以表述，就将部分心理危机典型案例作为附录，附在正文之后，避免了见事不见人，增加了志书的资料性和可读性。又如在集中记述北川中学灾情后，因正文不足以反映北川中学受灾的惨烈情况，无法传达和还原身处现场的惊心动魄，就附了一篇较为典型的从现场传回的新闻报道。再如对安县桑枣中学的记述，正文只介绍了师生“零伤亡”、教学楼成为危房、直接经济损失2435.5万元的受灾情况，比较干瘪。其后收录的新闻稿《桑枣中学：2300多名师生无一伤亡》，则详细描述了桑枣中学师生平时展开应急演练，校长叶志平花大力气对校舍进行维修加固的情况，以及地震时师生紧急、有序疏散的情况，对正文进行了较好补充，具有较高

的存史价值。

大事记时间精确定位问题 大事记的时间性是第一位的，精确的时间定位能增加大事记的存史价值和参考价值。由于地震的突发性、灾情的严重性、抢险救援的紧迫性，决定了《绵阳抗震救灾志》大事记的时间定位必须精确到某时某分甚至到某秒。为使大事记时间定位更加精确，一方面高度重视包括大事记在内的全志的时间定位问题，要求各单位报送的资料必须有确切的时间，不得笼统使用诸如“地震后”“第一时间”这种模糊的提法。另一方面，尽量扩大资料来源，将各单位报送资料、新闻稿件、对各县（市、区）甚至当事人的调查采访等相互比较、印证，以便得到更精准的时间定位。通过努力，我们将灾情初发时期、黄金救援时期的29条大事记，每一条都精确到了某时某分。

此外，由于绵阳灾情和抗震救灾工作的复杂性，同一天发生的大事，甚至同一时间段发生的大事较为集中，如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到5月15日14时28分，即救援学意义上的“黄金72小时”内，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全市动员干部、调动装备参与抗震救灾，国家、省、市领导赶赴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市内外医疗和救援力量到达灾区，北川等地灾民撤出灾区，新的灾情不断出现等事件集中发生，共选取65条大事记；5月12-31日收录大事记175条，是整个抗震救灾志大事记中信息含量最丰富、事件密度最大的一个月。

问题探讨

资料收集困难的问题 资料收集工作由7个牵头单位100多个参编单位层层分工、共同完成，实施中困难重重。一是入志资料的范围广、涉及单位多，资料不好收集，不易收齐。二是特大地震的突发性和毁灭性造成资料收集困难。三是特大灾难突然降临时，缺乏应对紧急情况的经验，难以提前介入，不能提早进行资料收

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料收集困难。

关于上述问题，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扩大资料收集的范围，除各级各类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新闻媒体外，还要面向社会和个人征集资料；资料的形式要突破，不仅有文字资料，还可以有影像或录音资料；建立地方志资料收集应急预案，明确规定在遭遇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地方志工作者的职责、资料收集的规范形式、资料保存的方式等，使资料收集工作能提前介入。

编纂工作模式的问题 市政府成立编委会，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研究解决编纂和出版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编委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志办），负责全志编纂出版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人员培训、督促指导、送审稿初审等工作；绵阳军分区、市防震减灾局、市卫生局、市民政局、市发改委、市人社局为牵头承编单位，成立编纂领导小组或编委会，组建编辑部，具体组织领导各篇的编纂工作，负责资料征集、编纂初稿，初稿编纂完成后向编委会办公室报送；各县（市、区）及市级各部门为参编单位，负责按照篇目和编纂要求，向牵头承编单位报送资料或初稿。

在实际工作中，这种编纂模式造成工作格局混乱，推进困难，工作进度和质量受到制约，表现在组织协调难度大、质量难以保证、参编单位无所适从、业务指导脱节等。

其经验与教训说明，要成立指挥有序、运转有效、职责分明的编纂组织机构，切忌机构重叠、交叉重复、有名无实、职责不清。要切实减少编纂工作的中间环节，任务落实到单位，工作指导到单位。要下大力气培养一支专兼职修志队伍，注重平时培训，重视人才储备，为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作者单位：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写好志书概述 打造精品佳志

□ 李长山

概述在新方志编纂过程中已成为固定体裁之一，具有统领全志的作用，其质量水平直接关系到对整部志书的评价，也直接关系到志书资治功能的发挥。一个好的概述，读者用较短的时间即可了解当地的全形大势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产生兴趣。反之，概述逊色，甚至低劣，读者阅后，索然无味，很可能就弃之不读。

概述应准确理解其基本内涵

概述，即概而述之。要观一地之全形大势，领略一方之特色大要，高屋建瓴对一地的情况作总的概括。概述作为一书之大略，全志之总揽，不仅要写出一地总貌，更要写出一地之灵、一方之神、时代之气、民族之魂。因此，概述在修志中一直被视为最难驾驭的一篇。

方志专家王晖曾总结概述撰写五要：一要“概”——鸟瞰全志，概而述之，但不泛泛而谈。二要“通”——通贯古今，通览各业，但不面面俱到。三要“特”——特事特写，特色鲜明，但不言过其实。四要“简”——简而周详，淡而情

深，但不简单罗列。五要“活”——语言活泼，引人入胜，但不文过饰非。

从已出的志书看，多数概述写得像概况、梗概、简介。但“概述”和“概况”是有区别的，概况仅是记其表象，是本地、本单位的大体情况介绍；而概述有论述，对本地、本单位的兴衰起伏、优劣长短、经验教训、发展规律等有分析、有看法、有结论。

有人认为概述是基本情况的浓缩反映，把各分志高度压缩，就是概述。这种说法也不确切，概述的内容尽管和各专志有共性，甚至是互见，但不是“浓缩”，因为“浓缩”是机械的凑合，是各分志小序相加的“大拼盘”，其弊端是结构松散，篇幅臃肿，内容庞杂，可读性差，且势必与后面的专志大面积重复。概述不是一般地记述本志各篇章所没有设置的内容，也不是各篇章主要内容的摘引，而是以全志内容为基础，进行系统的研究，找出全志中所记述的各类事物、事件发生的条件根据，以及特点和相互联系等。概述既

体现志书的内容，又高于志书的内容，这也是概述与志书各篇章之间的重要区别。

概述应在继承创新上下工夫

写好概述要在继承创新上下工夫。继承不是简单地继续和沿袭，而是有着扬弃的内涵，将优秀、科学、精华的部分继承下来，把过时、不科学、不适用的部分及时剔除，使之更臻完善。

首先，要做到担纲揽总、条理主次、分明层次，客观、整体地阐明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主要矛盾与其他矛盾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诸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进程，揭示纷繁的表象事物内部的发展规律。写好概述，除在资料上旁搜远绍，事实上精心考证，体例上多方借鉴，编纂上意匠锤炼，还要取他人之长，创先人之无，不仅要站在本地看本地，更要从全省、全国的角度来分析和抉择。

其次，就是掌握地情。经过数地对当地地情资料的收集、研究、筛选、总纂，把本地的特点、发展规律、重大决策了如指

掌，对当地的历史和今天以及各个领域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重点特色、经验教训、战略措施等成竹在胸。这样才能从浩繁的资料中剪裁精当准确的典型材料，巧妙运用，写出有声有色、可读可用的概述来。

第三，熟知前志的特色、经验、不足，才能扬长避短。续志与前志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概述应发挥其纵横交织、统摄全志的功能，做好与前志的衔接，对前志已记述的内容，变化不大的，如位置、地形、气候等，从简略述，对前志应记未记的人物，重新补记；前志已有记述的人物，根据续志内容的需要，仍需专记的，从略简述，以保持内容的完整性。前志的资料，从新的角度用；前志有的要有，前志没有的也要有；前志用过的从略或变角度，前志没用的从详、突出，使续志的概述有一些特色、独特、新颖的东西，以提高其深度和自身价值。

概述应指点关节，突出特点

概述的撰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选择结构、确定写法，到取舍剪裁、组织材料，要恰到好处就需要在熟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从中遴选出特殊、突出、最能代表本地的资料，以便在撰写大势大略的同时，通过昭示典型来展现本地的优劣之势、兴衰治乱之

由，探讨客观规律。

一是应当指点关节。从整体的角度对全志主要内容和基本规律进行高度的概括和阐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中摄取全志的典型事件，选择历史关键点和转折点的大事，把典型事迹、典型人物、典型特产等进行科学地结构组合，使之珠联璧合地构成一个宏观的整体，用精练的语言叙述完整，形成高屋建瓴的独立之篇。二是善于抓住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特点，就写不出特色。三是努力突出特点。力求写出自身特色、当地特色、时代特色，写出独特的志书概述。

概述应文字简洁，可读性强

志书的概述是一种特定的作品，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具有较高的学术要求。作者应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驾驭文字的功力，概述语言要节奏明快，描述要生动形象，观点要鲜明准确，气势要纵横驰骋，力求文笔更严谨、朴实、简洁、准确，体现概述的记实叙事性。

首先，概述的资料要丰富，真实可用。志书全面、系统、容量大，集一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方方面面信息于一身，所记资料纵贯古今、横陈百业。只要记述翔实、准确、科学，读之有益，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这就

需要征集筛选大量鲜活有用的资料。记述时要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资料的记述之中，必要时作画龙点睛之笔，力求彰显因果、揭示规律，力戒是非不明、平铺直叙的记述方法。

其次，要讲文采，努力使语言优美。志书的文采有别于其他文体，简洁、朴实是志书语言的基本要求。应力求做到严谨而不呆板，切实而不空洞，简洁而不含混，概括而不抽象，具体而不繁琐，流畅而不虚浮，通俗而不粗陋，庄重而不枯燥，让人读起来舒服。好的概述，是经过“一字千改心始安”的执著精神，字斟句酌，精雕细刻，不断增补完善，反复修改推敲的结果，是史志同仁集体智慧的结晶。有了这千锤百炼，才会创作出内容的真实美和充实美以及表现形式的结构美和语言美的传世之作。

作为志书眼睛和灵魂的概述是一部志书的精华之所在，更是编者水平之体现，打造精品佳志，写好概述是前提。修志同仁应高度重视概述编写，高标准、严要求，创新思维，锲而不舍，精雕细刻，成就各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者单位：山东省潍坊市史志办公室）

校对工作是年鉴编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消灭资料差错、保证年鉴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口。要努力做到“四个增强”，即增强编校人员的责任心，明确编校人员职责；增强编校人员的质量意识，把校对质量作为提高年鉴质量重要环节来抓；增强编校人员的职业道德，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扎实的文字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增强编校人员的校对技能，提高校对业务水平。

采取三种校对方式并行

编校人员自校 年鉴初稿形成后，一般要经过三校，由编校人员校对自己编辑的稿件，查找编辑时没有发现的差错。年鉴资料大多由供稿单位提供，其中数据相互矛盾、事物与事实情况不符的隐性差错经常遇到。这些差错，有些是撰稿人的笔误，有些则是撰稿人在收集资料时未能仔细辨别，将相互矛盾的数据报送年鉴编辑部。编校人员在编辑稿件时，由于疏忽或把关不严，让某些差错在自己眼皮底下“漏网”。实行编校人员自校，是因为他们熟悉自己编辑的稿件，发现差错与撰稿人联系方便，解决差错比较得心应手。

编校人员互校 在自校的基础上，对稿件实行交叉校对，相互查找自校时没有发现的差错。一部年鉴由若干人合编而成，每个编校人员都有各自的分工，分别编校某一块或几块稿

把好评年鉴校对关口的几点看法

□ 詹跃华

件，有些数据和事物在自己编校的部分出现，在别人编校的部分也出现，常常相互抵牾。实行编校人员互校，就能发现那些数据和事物的差错，降低年鉴稿件的差错率。

众人参与校对 邀请供稿单位、报社相关人员或公开招聘社会上有一技之长的人员参与校对，查找互校时没有发现的差错，把“隐患”消灭在出版前。

校对稿件要做到五个对照

事物与事实相对照 年鉴稿件中的某些事物、某些数据与事实不符，编校人员需要寻根求源，认真核对，不能出现常识性、知识性的差错。如年鉴大事记类目记述“4月31日，某高速公路路段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死亡3人”，这31日与事实情况不相符，因为4月没有31日。当遇到事物、数据与事实情况不相符时，应及时纠正，切莫因事小而不为。

前后文之间相对照 年鉴稿件中的资料有些由编校人员收集，有些由撰稿人提供，不同的撰稿人对同一事物提供的资料，常常存在一些矛盾现象，主要表现在：(1) 综述与概况的矛盾。某类目的综述资料与类目下各分目概况之间的矛盾，如法治类目综述由政法委撰稿人提供公安、检察、审判、司法四个部门概括性的资料，但与这4个分目下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撰稿人提供的资料，在某些数据上



有出入，这就必须核实。(2) 概况与条目的矛盾。某分目的概况资料与分目下条目之间的矛盾，如房地产管理分目下的概况记述“2013年全县建设保障性住房256套”，但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条目中却写“226套”，前一数据是从《政府工作报告》摘抄，后一数据是由县房管局提供，撰稿人未能认真审查，造成前后矛盾，必须核实。(3) 总数与分数的矛盾。某条目中的总数不等于其分数之和，如人口民族分目记述“2006年末全县总人口34.18万人，其中男性17.65万人，女性16.57万人”，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加起来，大于全县总人口数。(4) 类目与类目之间内容的矛盾。如概览类目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分目，记述“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685亿元”，但在农业类目下的综述分目中，记述“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665亿元”，两者相差20亿元。把前后文之间的资料相对照，就能发现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并及时解决。

文字与图表相对照 年鉴稿件中的文字记述要与图表反映的内容相对照，看其是否一致。(1) 检查文字记述与图内容是否脱节，年鉴刊登图片较多，图片与其文字说明不吻合，容易发生张冠李戴的现象，在校对过程中应认真核实。(2) 检查文字记述与表内容是否一致。如林业分目文字记述“2006年全县查处森林案件206件”，但在“2006年全县森林案件查处情况表”中却记为“200件”。

与统计数据相对照 年鉴是由各级人民政府主办，其资料具有权威性，稿件中的数据，要与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相对照。凡是统计部门有的数据，年鉴应以统计部门为准；

统计部门没有的，应以各单位提供的数据为准。如金融分目记述“金融机构年末各项存款余额563亿元”，而统计部门公布的各项存款余额568亿元，应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

与上年数据相对照 年鉴是逐年编纂的年度资料性文献，有些资料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一年一年的积累起来，可以展现地方发展的脉络。年鉴中所记的数据，应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求编校人员校对稿件时，要把有关数据与上年年鉴相对照，及时发现问题。如城市建设分目记述“2008年全县自来水供应量为600万吨”“2009年全县自来水供应量为6000万吨”，这显然不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经与自来水公司核实，才知是撰稿人的笔误，2009年全县自来水供应量应为612万吨。

建立校对工作考评机制

建立鼓励先进、惩戒落后的校对工作考评机制，组织专人对编校工作进行考评：(1) 稿件中的文字、标点符号、数据、图表版式和字体、字号是否存在差错，事物记述与事实情况是否相符，语句是否有逻辑错误；(2) 稿件中的页码顺序，书眉、注文和注码、图表顺序，图表与正文衔接是否有错；(3) 稿件中的版面格式和文字、图表等统版、缩面工作是否符合要求。计算出每位编校人员的校对成绩，好的实行奖励，并将其列为当年评先的重要依据；把差错责任追究列入考评机制，对成书后发现的差错，追究其编校人员的责任。

(作者单位：江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志书年鉴编辑工作小议

□ 李志华

文字叙述要消除各唱各调的现象

第一，要实现第二次统稿。责任编辑要站在总编的高度，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文化公司，编辑时要充分发挥主动性，认真负责，仔细阅读，起到第二次统稿的作用。不管是志书、年鉴，一本书一般只宜采用一种叙述格式，一套（部）丛书也要将每本书统一成一种格式，不能在编辑修改出版后还是各唱各调，各篇章仍然各自为政各举旗号。

一是出版社要对出版负责。一些出版社审核出版书稿有许多不足，有的由于稿件较多，催稿又急，只能应付修改一些错别字，不仅谋篇布局和锤炼标题等无暇顾及，就连技术性问题都比较突出；有的追求表面形式，编辑批语不是罗列全部的错别字，就是将自己不熟悉不理解的作为疑难问题全部列举出来，要求查找补充，然而有些根本不是问题。如少数民族地区有许多人名地名比较生僻，有时读不断句，笔者见过一部书有一句话是“书记阿什老轨……”，编辑就提问“是哪本书中记载的？啊（阿）什老轨是地名还是工具？是桥梁还是机器？应加注。”弄得作者啼笑皆非。

二是文化公司要有文化底蕴支撑。这些年星罗棋布的文化公司如雨后春笋，但是真正能够承担起文字编辑功能的却凤毛麟角。有的文字编辑业务能力不强，不懂史志年鉴业务，不能驾驭志书专业文字编校，无法提高编辑出版质量；有的文化公司只具备一般排版技术，印

刷出版的书籍连错别字都无法校正，对跳行跨段、漏条混目、残章败节基本上两眼一抹黑，更谈不上遣词造句、字斟句酌、病句修订，无法实现第二次统稿。

三是对一般技术性问题要予以统一。比如：叙述“1985—2005年”与“1985年至2005年”，“五年”与“5年”，“二十年”与“20年”，“截至2005年”与“至2005年”，“1990年年底”与“1990年底”，“千米”与“公里”，“千克”与“公斤”，“说明”与“备注”等，在一本书中都应统一，甚至一套（部）丛书也要统一，让专门著述的特点和风格表现得尽善尽美。

四是不要迷信“黑马”软件。“黑马”对于文字编辑校对，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有的错误仍然不能识别，所有标记问题都需要人为鉴别。

第二，要熟悉编辑出版规范。及时学习编史修志的新规定，掌握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涉猎约定俗成的新要求。大到篇章设置，小到标点符号，都要仔细斟酌反复推敲，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如常用的中国历代纪年和公元纪年等的表达方式。

第三，要使用专业叙述。一是有些文字在特定词组中已暂停使用。如“姓氏笔划”与“姓氏笔画”，前者已经停止使用；二是尽量使用书面用语，减少个人感情色彩，更加贴近志书规范。如“我国”与“中国”，“以来”与“以后”，“三十年来”与“三十年间”，“来凉山”与“到凉山”，“元月”与“1月”，“本地”与“当地”，“幅员面

积”与“辖区面积”等，一般均使用后者；三是不用时序词语。如“近来”“近期”“目前”“现在”“今后”“以后”等，“近来”“近期”应为何时到何时，“目前”“现在”应为志书截止下限时间，“今后”“以后”超过下限不必叙述。

第四，要严格统一上下限。一定要遵循凡例规定的上下限，上限可适当上延，简要追溯历史；下限应坚决截止，一刀切断。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上限不上延，往往一起笔就是上限年月，没有事业发展变化的由来，看不到起源过渡，读志用志时还得找寻前志对照；二是下限任意终止，有的将就资料，有内容就写无限长，无资料就写短而简；三是凭自己的感情臆断，把自己以为重要的人和事任意下延，形成不严肃的状况。

第五，要精编而不是精简关键字。中华民族文字源远流长，字词意义博大精深，多一字少一字千差万别，不要轻易精简关键字，造成叙述情理混乱，违背中文词义，不合事物由来。一是少数民族名称不能简化，如蒙古族不能简称蒙族、傈僳族不能简称傈族、维吾尔族不能简称维族等，必须写全称。二是第一卷、第二卷、第三篇、第四册、第五会议室等，“第”字不能简化，否则就造成数量的误解。三是“1991年前”“1991年后”“21世纪后”应为“1991年以前”“1991年以后”“21世纪以后”，“以”字不能减少。

第六，要实写人物。一是人物传记，对入志人物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尽量杜绝对人物的夸张、渲染、褒扬、诋毁，不要把人物写上“伟大”“优秀”“反动”等按语，而是将人物的具体事迹写出来，“寓褒贬于叙事写实之中”，不掺杂个人评论和片面观点。二是人物简介，要对简历编写规范统一，兼顾所有人物，文字长短基本一致，不要议论个人得失功过。

标点符号应该严格标准规范

第一，合理使用冒号。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句子叙述完成后出现的“其中”。一般情况是“其中”后面用并列的逗号时可在“其中”处用逗号，如果“其中”后面用并列的分号或

句号时应在“其中”处用冒号。二是在志书编委会等专页，领导人职务用黑体、人名用楷体就已经区别开来，职务后用空格即可。三是冒号后同一个问题的句子中不宜再连续使用冒号，以免重复提示，语句混乱。

第二，规范使用顿号。具有独立意义的句子应改过去的顿号为逗号，仅保留短语用顿号；标有引号或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过去规定使用顿号的现在不再使用。

第三，连接号的使用。专用名词数字间或表格连接用半字线，地名和时间的连接用一字线，数量范围之间连接用波浪线。

第四，逗号使用较长。有的文章中整个一段话，几句、十几句、几十句都用逗号，仅在结尾处使用一个句号。应该在文章句子意义有变化或意思有转折时，及时使用句号。

第五，正确使用分号。有的文章在一段话中，短句使用分号，并列句子使用分号，并列的问题使用分号，几种句型的分号造成叙述混乱。应该把短句用逗号，并列的句子用分号，并列的问题用句号。把句型类别问题区分开来，做到一目了然。也可以适当提行分段减少分号使用频率。

第六，区别使用括号。志书年鉴对四种括号都有使用，要区别在不同情况下的使用要求。一是文件年份规定使用六角括号，时常会错用圆括号、方括号、方头括号。二是人名地名等说明，有的用很多个并列括号，比如民族、性别、任职、兼职、专家、处分等内容不必分别括号，应该合并为一个括号，用逗号、顿号、分号等点号隔开即可。

第七，避免使用问号、叹号。志书是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叙述，不涉及问题的提出和解答，也没有感情的抒发，所以一般不用问号、叹号。

番号不能随心所欲改变顺序

第一，番号等级错乱。篇章节一般没有问题，主要是节以下没有统一成“一、（一）1.（1）A”等番号级别，而是按照原始材料的番号照抄，致使下级番号可能高于上级番号。上级番号可以跳跃管理下级番号，比如：一、1.或

一、(一)(1)等;但是下级不能管上级,比如(一)一、(1)1或1.(一)一、(1)等。

第二,段内不宜连用同级番号。有的著述自然段内连续使用几组同一级番号时,没有上一级番号截断管理,造成一段话叙述杂乱不清,阅读条理不清,观点含混不清。这种情况应设置上级番号管理,或者提行分段区别。

第三,番号错误跳跃。一种错误是有的第四章后是第六章,第三节后是第五节,因相距页码过多,一般不易察觉。还有一种错误是文章前面说“下面分四个问题叙述”,却写了五个问题或三个问题且序号杂乱无章等等,这些都需要及时动手记录,反复对照,予以消除。

第四,文内慎用“高级”番号。在一个自然段里一般使用较小级别的番号,使用“一、(一)”等高级番号应谨慎。特别是提行分段处要避免使用“一、(一)”等级别的番号,以免造成编辑校对、字体字号等不必要的混乱,特别是与一二级标题错乱。

第五,一个问题不设番号。凡是一个问题不能列为一个章节,一个大类不必使用番号。经常会看到错误的写法是,写了第一章或第一节或第一点后,再没有第二章或第二节或第二点,使人误以为掉段,产生歧义。

技术性问题随意操作要纠正

第一,表格制作不标准。有的不是开口式,有的宽度小于文字版式,有的没有名称或者名称在表下方,有的表头没有表号或计量单位,有的内容较少也用横排,有的表内数据没有个位或小数点对齐,有的表内文字没有左对齐或者任意空格跳格,有的表内数据总数与分数不一致,有的表下说明字号没有小于表格或者表内文字号等。必须按统计规范制作,校正统一。提倡使用无网式表格,即除表头和下划线外,不用横线,表格做到开口式、少横排、数对准、要素全、版式齐。

第二,字号设置不一致。有的下级标题的字号大于上级标题,有的同级标题是几个字号,有的地方规定应用特殊字体(黑体、仿宋、楷体)仍使用普通字体,有的落款使用黑体,有

的存储时拉错整页的字体,需要细致对照统一,及时纠正混乱现象。

第三,计量单位不统一。要仔细清理书中亩、斤、尺、里等计量单位问题,在换算时,注意换算方法和标准,核实小数点和计量单位,保留原始依据核查。对表格可以保留习惯计量单位(在凡例说明),以免加大工作量和造成换算错误。

第四,提行分段不严谨。一是整页甚至几页不分段,几千字一大段。应仔细斟酌推敲段落大意,按照叙述要点的不同,按照问题类别,按照意思的变化转折等情况提行分段。尽量做到每页都有几个自然段,使著作版式美观,阅读可自然停顿。二是一句话或两句话分一段,空白过多,读起来既松散也不得要领。应把相近意义的句子连接起来,用句号或分号隔开,减少一些短句自然段,给人以紧凑感。

第五,数据使用不规范。一是不习惯收整数,有的著述出现十来位不收整数的现象,阅读时要从个位数到亿,既费时又容易疲劳,还会产生反感。因此,要尽量做到5位收“万”的整数,9位收“亿”的整数,减少“千分撇”“千分空”的使用频率,4—5位数可以不用“千分撇”“千分空”。二是小数点使用不标准,有的小数点用全角而数字散乱,有的写成“180.00米”,小数点后“00”实际为无效数字。有的小数点前仅一二位,小数点后保留四五位,尾大头小,既不美观也不重要。要规范使用小数点,仔细观察数据间隔,小数点后一般保留两位,整数不必再加小数点。三是把数据中的“00”写成“〇〇”,也要纠正。四是在万以下错误收整数,写成4千元,3百人,应全部使用阿拉伯数,为4000元,300人(也可写作四千元,三百人)。五是数字连读,有的写为7、8万人,2、3百人,也是错误的,正确写法为七八万人、四五百人。六是数字排版要使用正体二分字身,即两个数字占一个汉字。

(作者单位:凉山州史志办公室)

试论新形势下地方志宣传工作

——以内江地方志宣传工作为例

□ 余崇威

地方志宣传报道工作是促进社会公众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地方志工作有更加全面、正确、深刻的了解，提高人们对地方志工作的认识，从而得到全社会的更广泛理解、重视和支持，促进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途径。笔者就内江市以“六抓”为推手的地方志工作宣传经验为例，浅谈对新形势下地方志宣传工作的认识。

抓统一思想，提高方志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地方志工作是代表、宣传和建设先进文化的载体，是为党立言、为人民立言和为改革开放立言的政治任务，是为人民服务的一项事业。第二轮修志工作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修志工作不仅仅是修书，更重要的是通过认真回顾、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实践经验，为新时期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借鉴，真正做到用成就激励人，用经验教育人，用历史警示人。要充分发挥地方志在地方行政工作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努力提高地方志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在紧紧围绕党委政府

中心工作的同时，统一全体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为搞好史志宣传奠定思想基础。建议可以坚持每月定期或不定期地围绕地方志理论、时事政治、宣传报道等内容，召开学习会，并制定中心发言人制度，把大家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一起，不断提高方志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抓队伍建设，为搞好方志宣传提供人力支持和智力支撑

地方志宣传工作的主体是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必须发动全体地方志工作者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去影响、扩大宣传主体，同时也要狠抓通讯员、宣讲员、研究员和业余爱好者四支业余队伍建设，使地方志工作宣传队伍不断壮大，并由官方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向层次性、多维性和社会性转变。内江市史志办将原活动于市中区多家茶馆的“文史沙龙”爱好者62人纳入“内江市地方志业余爱好者队伍名录”，并规定全市3县2区各史志机构必须发现并组织不低于30人的业余爱好者队伍、不低于20人的通讯员队伍、不低于5人的宣讲员队伍、不低于3人的研究员队伍，将名单上报市史志办备案，成为内江修志工作及地情征集工作的后备力量；每周举办1次“史志沙龙”活动，积极为内江史志发展出谋划策；要求每个通讯员每年至少完成10篇稿件，根据稿件的质量和数量，年终评选出好新闻奖和上稿总量奖。为把“四支队伍”打造成素质强、业务精、作风硬的骨干队伍，不定期地组织开展人员培训，不断增强其文化素质、业务素质 and 宣讲能力，为搞好地方志宣传报道提供人力支持和智力支撑。

抓平台建设，不断改进宣传报道的形式和内容

首先要明确地方志工作宣传的形式。一是充分发挥各级领导讲话的号召力和推动力，利用期刊、工作动态或简报等形式，编发各级领导的讲话、谈话和各级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志的方针、政策，获得社会的尊重和理解；二是结合各种会议、专题汇报等向上呼吁领导重视和支持，向下

宣传修志工作形象；三是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宣传成就、宣传形象、宣传作用、宣传社会地位，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四是把地方志知识纳入党校主体班的教学计划，并由史志宣讲员授课；五是重点打造“史志沙龙”等类似活动，坚持每周开展一次活动；六是开设“史志天地·和谐讲堂”等类似讲座，定期宣讲。

其次要明确宣传报道内容，大致围绕地方志工作的意义、基本任务、法规和地方志开发利用四个方面去开展。做到新办简报每月一期，重要简报不定期，随时随地向领导和社会各界介绍各地方志工作开展情况；制作史志知识宣传展板，内容涉及当地历史概况、古今知名人物等，陆续在机关、公共场所、企业、学校等地巡回展出；网站建设和网站内容做到栏目不断翻新，内容不断更新。

第三，抓宣传载体和工作平台。如创办方志内刊，使其成为了解、宣传本地、本部门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地情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史志工作平台；创办地方志学会，进一步扩大史志爱好者队伍和地方志理论研究员队伍，不断提高史志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组织出版一些地情出版物，更好的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

第四，充分利用史志鉴和相关地情资源为社会各界开展咨询查阅服务。为当地领导和有关部门了解本地历史与现状提供资治参考；在各级各类新闻信息、招商项目、工业建设、新城建设、文艺创作等方面提供大量资料。

抓活动开展，扩大史志文化影响力和知名度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和宣传的内容，确定每个时期宣传对象的范围，同时配合各种各样的活动，推出有地方志特色的配套工程，充分发挥优势反复宣传，从而增强人们对地方志工作和地方志作用的认识。

一是开展“五进”活动。以史志知识、优秀传统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组织宣讲员队伍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行宣讲；与其他部门联合举办史志知识活动讲座。

二是开展史志沙龙活动。三是充分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如与电台、电视台签定史志宣传合作协议，开设史志相关栏目；建立通讯业务联系，请记者作专题采访等。四是利用网络发布各类正面宣传、舆论引导帖文。五是横向联合，形成良性互动。积极主动与政协文史委、文化局、档案局、社科联、图书馆等相关单位联系合作，形成良性互动、资源共享的和谐文化共创局面，以增强地方志的影响力，使地方志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现实。

只有让人们通过读志用志获得益处，了解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才能真正提高他们对地方志工作的认识，取得他们对地方志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抓汇报沟通，争取领导重视和支持

地方志是“官书”，它对政府机关和领导的科学决策有着重要的资治作用。只有让各级领导干部都认识了地方志的作用，重视了地方志工作，地方志工作才能顺利开展。因此要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汇报工作，宣传地方志工作的意义、法规及各地工作拓展情况，引起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对史志工作的高度重视，解决一些如人员、经费等方面的难题，有利于史志工作的健康良性发展。

抓经费投入，为搞好史志宣传提供经费保障

要狠抓经费来源和经费投入，通过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实际，赢得领导的信任和支持，真正把史志事业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把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基本上做到一步到位。在投入方面，一是投入资金改善工作条件；二是为每周一次的史志沙龙活动提供必要经费，保障活动顺利进行；三是加大培训经费投入，加强宣传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四是地情资料书提供人员编校和出版经费的支持；五是史志刊物、方志网站和简报提供资金支持；六是加大投入宣传经费。

(作者单位：内江市地方志办公室)



绵阳市游仙区打造玉河镇“状元文化”的启迪

□ 张 洁

地情是指一个地区的自然、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它所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土人情。深入挖掘、系统整理、多元展示区域地情人文资源，可以提升地方品位，增强地方魅力，凝聚地方人心，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和谐发展。让地情资源成为党委、政府掌握区域基本情况资料库，成为基层群众了解区域历史文化的窗口，以文化凝聚人心、促推发展，是地方志部门的重要职能之一。

绵阳市游仙区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辖24个乡镇，乡镇地情资源十分丰富，为此，游仙区志办对乡镇地情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了一些规划和探索，例如，打造玉河镇“状元文化”、柏林镇“百年教堂”宗教文化和“玫瑰之乡”、东宣乡“红色文化”、徐家镇

“万亩葡萄园文化”等特色地情。玉河镇“状元文化”的打造，即是利用地情资源、古为今用的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社会反响较好。

“状元文化”的历史背景和由来

“盐泉古县，状元故里”玉河镇位于游仙区东南角，距离绵阳城区43公里，在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先后为魏城县、盐泉县治所，建县历史达725年。因境内盐业发达，商贾云集，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域。宋代著名状元苏易简出生玉河，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为绵州之圣贤，影响深远，增誉故里。其两孙苏舜钦、苏舜元亦非常有名，祖孙三人有“小三苏”之称。

状元文化，一脉相承 近年来，玉河镇提出建设“农业经济强镇、商贸人文名镇、幸

福民居新镇”的目标，充分利用“盐泉古镇”这一千年文化遗产和“状元故里”这一金字招牌，大力发展乡村文化生态休闲旅游。一是对“状元文化”进行提炼，新建母教文化园、状元大道、状元广场、乡村博物馆，编撰《少年苏易简》通俗读本，组织群众讨论。二是组织开展“十大苏母”“十大状元”评选活动，邀请《四川日报》《绵阳日报》等媒体进行宣传；三是在学校、社区、单位、村社开展讲状元故事、诵状元经典活动，把状元文化与校园文化、乡镇文化、社区文化有机整合起来。

通过宣传打造，省市一些历史学家、考古专家多次前来对状元文化、盐泉遗址进行进一步发掘，一些文学家、书画家、摄影爱好者也纷至沓来进行创作。

留住历史根脉，传承乡村文化 面对乡土文化的急剧流

失，一些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有识之士呼吁给下一代留下传承乡土文化的基地。在区志办建议下，玉河镇党委、政府在玉河博爱学校建立起了“乡村博物馆”，作为“状元文化”的一部分。博物馆藏品共500多件，主题是农耕文化，是发动当地老百姓多渠道收集来的各种古老的物品，如清朝的匾额，祖传的太师椅、风车、水缸、石磨……乡村博物馆的建造、藏品的收集和挖掘，对乡土历史的保存和传承，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弘扬，对乡村情感的唤醒和留存意义重大，是留住历史根脉、“留得住乡愁”的创新举措。

打造“状元文化”对地情开发利用的启迪

地情资料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具有丰厚的价值，区志办及玉河镇党委、政府把综合治理和开发当地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状元文化”作为发展的突破口，开发出极具鲜明地方特色的资源。

启迪一：在地情资源的管理和组织开发利用上，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敢于作为，积极创新

规范地情资源管理，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地情资源，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以地方志工作机构为管理主体的原则。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为

地方志工作机构履行地情资源管理职责、组织开发利用工作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依据。二是综合治理的原则。在地情资源的保护与宣传上，努力做到宣传主题突出、口径一致，管理规范有序、落到实处。三是科学规划、有序开发的原则。要根据各地的资源特色，科学合理地制定地情开发的远景规划和近期规划，确保资源的有序开发。

启迪二：地情要传承文明、服务社会、贴近群众，才有生命力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指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用志正是志书生命价值之所在。地方志工作机构只有坚持修志传承文明，用志服务社会，实行“两条腿”走路，不断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效果，才能赢得党委、政府的重视，稳固并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地情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最根本的意义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乡镇地情文化资源的利用始终以服务农村、服务群众为价值导向，向基层群众讲解和宣传当地的历史文化，深入基层收集和挖掘那些沉淀已久的文化瑰宝和风土人情，打造“状元文化”等乡村文化，让地方志工作者走出志书，融入群众，更接地气，更有活力。

启迪三：挖掘资源特色，突出人文重点，增强旅游魅力

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情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有发展潜力的旅游景区，不但要具有吸引人眼球的外在表现，还必须具有触动人们心灵的内涵价值。一是要挖掘资源特色，整合旅游品牌。对一地之自然、人文、历史、文化、民俗等地情资源进行筛选，充分挖掘出有特色、有影响、有价值的地情资料，进行有效整合，形成风格独特的地情资源体系，打造彰显一个地区旅游风情的整体品牌，为旅游业发展正确定位。

二是挖掘乡镇文化底蕴，充实景点内涵。在搞好景点硬件建设的同时，要组织力量对其历史、传说、文化等进行系统研究和开发，努力做到景点的外在魅力和内涵品位的有机统一。

三是宣传推介地情，提升旅游知名度。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有深度、有价值的宣传资料进行推介，以触动人们的心灵，震撼人们的灵魂。

开发和利用乡镇地情资源大有可为，传承传统文化，让人们听得见乡音，记得住乡愁，感受得到乡情。

(作者单位：绵阳市游仙区地方志办公室)

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好书

——《方志四川》品读

□ 潘认若

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方志历史，是记述著史传世的历史，是展现历史得以传承的历史。这部历史无疑是一部好书，需要大书特书。然而，现实中涉足者寥寥，特别是以电视纪录片文本的著述方式。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汪毅算是这寥寥中的一位。他近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新作电视纪录片文本《方志四川》，便是对四川方志历史如数家珍的记录。

通读这部新作，便跟随作者进入了一个时空隧道，一路领略四川方志历史美不胜收的景色——强健的骨骼、丰满的血肉、美艳的容颜，立体呈现在读者眼前。该书以四川方志发展的历史纵线为轴，以重要修志历史阶段为横切面，采取叙事与记人、图文并茂的方式，立体展现了四川方志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凸显了四川从清代、民国到新中国的修志史上所取得蝉联省级方志“三

连冠”的成果。如誉该著搭建了四川“纸上的方志馆”，再恰当不过。

优秀的历史著作，就应该像一部推理小说，从错综繁杂的史海资料中钩沉拾遗，条分缕析，依照一定的理论和逻辑关联诸多线索，层层推论，以求无限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四川是修志大省，历史悠久，史（志）家辈出，成果累累。逐一述说，要么信息冗余，要么挂一漏万，其创作难度可想而知。然而，作者凭借扎实的文史功底和对方志四川的敬畏以及恰如其分的拿捏，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精挑细选，精耕细作，搜罗出四川方志历史的菁华，行云流水，落笔成章，让仅有150千字的“薄书”，容纳还原了四川两千多年的修志历史，且有“大江东去”的抒发，又有“小桥流水”的聚集，“让我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

说起历史著作的文风，因



其题材局限，的确难以“调料”，不少作品给人留下“刻板”的印象。条清目明，平铺直叙，史料详实，中规中矩，读来常常令人索然无味。然而，《方志四川》可谓匠心独具，语言引经据典，简练婉约，颇显文采飞扬。信手翻书，例证随处可见：“当时光老人步履蹒跚，从西晋走到东晋，一部不以地名而以‘国’命名的志书诞生了，而且与巴蜀社会关系密切。它，就是常璩的《华阳国志》”“这些志书虽然不少随风淡淡而去，但它依然不乏风雷过耳的回响轰鸣，让我们心灵一次又一次澎湃感动，让我们情感一次又一次掀动如潮，让我们感受其魅力和文明创造的不易”……其实，当你翻开书中目录，从集名“醇香世界”（上下）、“魅力

天地”（上下）中，便可以领略到文字魅力四射的光芒。“愤青”“航母”“明朝的那些事儿”……近年流行的热词，更是让这部史书性质的著作有些“潮”了。

德国总理默克尔学烹饪于成都，所做菜肴是宫保鸡丁，但你知道“宫保鸡丁”创始人丁宝桢总纂《四川盐法志》的贡献吗？你知道历史上哪些皇帝诏令天下修志书吗？你知道日本编修《支那省别全志》的目的吗？你知道英国传教士汉明灯编纂四川的县志《广汉县

志略》吗……捧读《四川方志》，书中穿插的无数个或短或长的故事，巧妙地与方志历史融为一体，诠释了编修志书的目的、意义、功用等，寓理于事，引人入胜。可以说该著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精彩的史书，必然离不开精彩的故事。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优秀的作品是作者“苦”出来的。为了创新表现形式，作者突破传统史书写作手法，以电视纪录片文体的方式，用优美婉约的语言、鲜活

的故事和精彩的图片，使文字和画面水乳交融，既解决了方志四川发展史上节点与其中故事的兼容关系，又凸显出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时代特色，不仅具有视觉冲击力，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其出版既是四川地方志宣传的一个突破，又是全国第一部以电视纪录片文体方式展现方志文化的著作。

（作者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稿 约

《巴蜀史志》是由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管、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地方文化刊物，双月刊。以“信史、实学、新知、美文”为追求，设有方志论坛、年鉴指导、读志用志、爱志人语、史料之窗、人物春秋、古迹考辨、史海钩沉、风物名胜、民俗风情、艺苑风采、稗史逸闻、读书随笔、域外传真等栏目。为进一步丰富内容、提升水平、服务发展，现诚挚约稿：

学术文章。应有：内容摘要（180字左右）、关键词（3-8个）；标题不超过20个字；作者简介（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参考文献按顺序列于文后，请注明详细出处。字数控制在4000字以内。

其他文稿。文责自负。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不要重复投稿。字数控制在3000字以内。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永兴巷15号21楼

邮编：610012

邮箱：bsszjb@163.com

电话：(028)86522061

《巴蜀史志》编辑部



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研究

□ “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研究” 课题组

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现象就像一面镜子，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特征

现在的眉山市辖一区五县，即东坡区（原眉山县）、彭山区、丹棱县、青神县、洪雅县和仁寿县。宋时眉山建制，据《元丰九域志》^①载，除仁寿县之外，其他五县均隶属眉州，其中洪雅县在宋太宗淳化四年（993）隶嘉州。

本课题研究的进士群体，是指两宋时期具有眉山籍贯（只限于宋时的眉山县，所辖区域只不过二十乡、六镇，大约二万多户）、进士出身的个体组成的整体。进士个体有以下特点：其一，眉山籍贯。应出生眉山、祖籍眉山（上溯至三代）或者落籍眉山（移民至

眉山）。其二，进士身份。考取了进士或者朝廷赐予了进士出身，从相关典籍可以佐证。都说眉山有800进士，现根据《雁塔碑》（进士题名碑）、《眉山县志》^②和《眉山市人物志》^③统计，眉山有909名进士。

对两宋眉山进士群体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我们发现该群体具有如下特点：

向上趋势 宋朝眉山科举的发展盛况呈现出参加科考和考取进士的人数不断增加、步入仕途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北宋时期共有进士327人，而南宋时期共有进士582人。

北宋眉山的科举喷发肇始于宋仁宗嘉祐年间。苏轼在《谢范舍人书》^④中云：“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

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眉州眉山县参加礼部考试的人有四五十人，考中者包括苏轼兄弟在内共有13人，占当年全国进士总数388人的3.4%。难怪宋仁宗皇帝当时就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

北宋眉山考中进士的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宋仁宗在位的41年共考中进士80人，平均2人/年；宋哲宗在位的15年共考中进士63人，平均4.2人/年；宋徽宗在位的25年共考中进士135人，平均5.4人/年（见表1）。

南宋眉山的科举盛况可谓空前绝后，从进士人数看，眉



苏轼

州进士619人，而眉山县进士582人。即便是南宋京城所在地的浙江亦难以望其项背。在《略论南宋浙江进士文化》一文中作者惊叹：“在区区六府五州六十七县的土地上，南宋王朝短短的一个世纪半中，所出之进士可谓前所未有。这种科举盛况反映最清楚，体现最明显的首先是进士总数上，它总共向国家培养了6100名进士。”若以此为依据来推算，平均每州仅约555人、平均每县仅约

91人，仅是眉山县进士人数的约16%。南宋眉山，一个小小的县，进士人数居然占全国进士总人数的3%。

除南宋后期外，眉山考中进士的人数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宋高宗在位的35年共考中进士186人，平均5.3人/年；宋孝宗在位的27年共考中进士132人，平均4.9人/年；宋理宗在位的40年共考中进士215人，平均5.4人/年，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宝庆二年（1226）朝廷共取士989人，而眉山县就有71人，占总数7.2%，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见表2）。

巅峰状态 两宋眉山进士的井喷状态与当时科举发展完善和选举制度有关。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5]说：“省试录取名额是否按地区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北宋中期，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曾经就此进行过激烈的

辩论……司马光主张照顾地区差异，按照一定份额‘逐路取人’。而欧阳修则认为，应该按照考生的绝对成绩‘惟材是择’以防‘缪滥’。”欧阳修“惟材是择”的观点成为当时的主流，被朝廷采纳，眉山出类拔萃的“文材”便脱颖而出，逐步走上科举的巅峰。由此形成两宋进士在全国分布极不平衡的状态。

从时间上看，眉山县在两宋时期，进士人数达909人，而在唐朝1人、五代1人、元朝0人（因《雁塔碑》元代进士题名字迹不清，无法统计）、明朝29人、清朝8人，这些朝代的总数不过39人，仅为两宋进士人数的4%，与两宋时期的辉煌无法相比。眉州和陵井监（与州并列的行政区划）的统计数据：眉州唐2人、五代1人、宋970人、元0人、明44人、清22人，总计1039人；陵

表1 眉山市北宋327人进士分类统计表

	宋太祖 960—975	宋太宗 976—997	宋真宗 998—1022	宋仁宗 1023—1063	宋英宗 1064—1067	宋神宗 1068—1085	宋哲宗 1086—1100	宋徽宗 1101—1125	宋钦宗 1126
人数	0	2	7	80	3	37	63	135	0
备注				嘉祐 23		元丰 23	元祐 24 绍圣 28	政和 58 宣和 37	

表2 眉山市南宋582人进士分类统计表

	宋高宗 1127—1162	宋孝宗 1163—1189	宋光宗 1190—1194	宋宁宗 1195—1224	宋理宗 1225—1264	宋度宗 1265—1274	宋恭宗 1275	宋端宗 1276—1277	不详
人数	186	132	2	42	215	0	0	0	5
备注	绍兴 177	乾道 42 淳熙 79			绍定 73 淳祐 44 宝庆二年 71				

井监唐1人、五代0人、宋180人、元2人、明13人、清10人，总计206人。由此可见当时眉山县进士的无与伦比。

从眉州内政区来看，两宋时期的进士眉山909人，而彭山11人、丹棱26人、青神24人，三县总数不过61人，仅为眉山县进士人数的7%，与眉山县的盛况无法相比。从眉州划归嘉州的洪雅县两宋有进士60人，当时的陵井监两宋有进士180人，亦根本无法与眉山县相提并论（见表3、表4）。

一流个体 就“进士”而论，在科举文化史上，两宋眉山909进士，可谓无可匹敌者。苏轼兄弟虽然没有考中状元，但他们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流的人才。

从考试的角度看，虽然苏轼兄弟在嘉祐二年（1057）进

士科试中没有取得状元，但在嘉祐六年（1061）八月的制科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仅录取的三人中，苏轼兄弟皆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苏轼入三等，宋代制科入三等者仅有吴育、苏轼二人（一、二等空缺），苏辙入四等。宋仁宗皇帝读了苏轼兄弟的《进策》，觉得虽然言辞激烈，但眼光敏锐、切中时弊，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④

从成就的角度看，苏轼兄弟以其散文创作成果，汇入韩愈、柳宗元开创欧阳修推进的“古文运动”，以创作实绩而为当时和后世推重，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尤其是苏轼可以说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后人把苏轼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并称“四大家”，并有“韩潮苏海”之美誉。苏



苏辙

轼的成就还在于他的“天才全能”。从“文艺”角度看，苏轼在诗、词、文、赋、书画、绘画等方面有杰出的贡献；从“文化”角度看，苏轼在多个学科领域，比如美食、酒经、茶道、亭台、养生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文论、画论、书论、音乐学、农学、水利学、医药学等方面，也有自己的研究和造诣，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史上富有开创性的命

表3 眉山市·唐至清进士分类统计表

朝代	眉山	彭山	丹棱	青神	洪雅	仁寿
唐	1	0	0	1	0	1
五代	1	0	0	0	0	0
宋	909	11	26	24	60	180
元	0	0	0	0	0	2
明	29	4	1	10	7	13
清	8	2	9	3	6	10
总计	948	17	36	38	73	206

表4 眉山市两宋进士分类统计表

朝代	眉山	彭山	丹棱	青神	洪雅	仁寿
北宋	327	4	11	9	14	59
南宋	582	7	15	15	46	121
总计	909	11	26	24	60	180

题和认识。著名苏学专家王水照教授赞曰“说不完、说不全、说不透的永远的苏东坡”。

据不完全统计，眉山县进士群体中成就卓著《宋史》^⑥有传者14人：孙抃、石扬休、朱台符、苏轼、苏辙、任伯雨、任谅、家愿、任希夷、家铉翁、王当、史次秦、孙昭远、孙逢。

两宋眉山进士群体成因

宋代眉山进士群体的形成，与全国的大环境和眉山的小环境密切相关。

（一）客观原因

1. 宋朝的大环境

文官政治 “陈桥兵变”

宋太祖夺取政权，灭掉南方各国之后，为了避免武将篡权，遂削夺了各地节度使的兵权，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其核心是利用文人治理国家，即用文官掌控军队，派文官出任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长官。文官从何而来？自然是通过科举考试从读书人中选拔。

宋代开国以后的几代皇帝都非常重视文教，重视人才的培养。“重文抑武”国策有效地调动了文人的积极性，充分利用了智力资源，发挥了文化知识的作用，文人的地位和价值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科举完善 宋代的科举有长足发展。在考试原则上，宋代“取士不问家世”的限制呈

逐渐放宽趋势；在考试规则上，宋代强化了举子与考官的行为规范。

宋代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地方主持的选拔初试称之为“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全国性的选拔考试，曾经由尚书省的吏部、礼部主持，称之为“省试”，第一名为“省元”；皇帝亲自主持的殿庭复试，称之为“殿试”，第一名为“状元”。

宋朝立国之初，就把科举取士作为重大的国策，禁止任何私人的破坏干预。曾巩《本朝政要策》说：“至太宗即位，兴国二年，以郡县阙官，旬浹之间，拔士凡五百，以补阙员而振滞淹。又未命官，而赐之绿袍靴笏，使解褐焉。八年，进士万二千六百人。淳化二年，万七千三百人。始命知贡举苏易简等受诏即赴贡院，不更至私第，以防请托。至殿试，又为糊名之制。”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一是把读书中举就可以做官变成了现实；二是让读书人做官形成了规模效应；三是朝廷临时性的科举考试措施，变成了有正式机构（贡院）常规管理，并且各种规章制度严密，极大地保障了科举考试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从而增强了天下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的向心力。

文风转变 先秦、两汉的

文章质朴自由，不受形式拘束，有利于表达思想和反映社会生活。但自南北朝以后，盛行骈文。唐代中叶，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后人称之为古文运动。宋初，杨亿等人又大煽浮艳之风，滋生了“西昆体”。宋朝皇帝对不重内容偏重形式的文风十分厌恶。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和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三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

欧阳修继韩愈之后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他在主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时，反对柔靡浮艳、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青年才俊，逐步使文风发生转变。文风的转变，直接影响着科举考试的内容。

眉山学子还有得天独厚之处。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宋代初期，科举主要考声律，学子们学的还是五代盛行的骈文，追求的是柔靡浮艳。只有眉州的士人与众不同，通经学古，坚守好的文风，把西汉质朴自由、不受形式拘束的文词作为宗师。这是眉山进士群体能够出现的原因之一。

2.眉山的小环境

社会稳定 为了躲避关中、中原地区的战乱，唐、五代时期，向蜀中移民，前后持续了一两个世纪。这些移民顺岷江而下，来到风景秀丽、物产富饶的眉山一带定居。如石昌言的七世祖石臧用（曾任唐右羽林军大将军）召集家人说：“天下将有变，而蜀为最安处。”于是率家人徙四川眉山，遂为眉山人。

自北宋取得四川，至南宋灭亡，共有314年。期间，四川发生过王小波、李顺起义，历时3年，稍稍波及眉山；而宋与契丹、西夏、金之战，则没有波及眉山。眉山在宋代，基本上有300年的安宁稳定。

唐代至五代至宋代的600多年间，四川基本上是稳定的，而眉山则更为稳定安宁。

经济发展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在位期间，施行植树种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减免赋役等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大环境的影响下，眉州的官员亦跟随中央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例如，与苏洵同时代的黎希声任眉州知州，“仁明不苛”，减轻百姓负担，减少役使百姓，让百姓安于生产；魏了翁知眉州时，亦“课农桑，薄赋税，兴水利……是故政通而民和”。眉山

进士群体的形成，与宋代经济的发展有间接的关系，与眉山经济的发展则有直接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是进士群体形成的必要条件。

出版繁荣 在宋代，眉山刻印书籍已自成体系，有官刻、家刻、坊刻。官刻的有眉州郡府；家刻的有程舍人宅；坊刻的有“万卷堂”“书隐斋”等。他们刻印的大量书籍，刻工精湛、版式疏朗、校勘精细，具有鲜明的蜀本特色。其中，著名刻匠王朝刻的《册府元龟》（1000卷）、《太平寰宇记》（200卷）、《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30卷）等书，属于“蜀大字本”闻名全国。“万卷堂”刊刻的《新编近时十便良方》（40卷）一书的最后有以下文字：“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刻，庶便于拾用，请详鉴。”这是古本中最早的刊记。程舍人宅刊刻史学家眉州人王偁著《东都事略》一书，在目录的末尾刻上了：“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这是中国最早在书中印有保护版权的标志。

到了南宋，眉山刻版印书已取代成都的中心地位，成为与浙江杭州、福建建阳齐名的全国著名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对书籍的大量需求，进而促进了耕读的氛围和学校的教育。

教育兴盛 宋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文教。北宋有三次兴学：“庆历兴学”主张兴学以培养人才；“熙宁兴学”提出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系统；“崇宁兴学”提出在全国的州县普遍设学。

两宋时期，眉山任职的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如董储、黎希声、魏了翁等。南宋末赵与峕（“时”的异体字）《宾退录》卷一记载，眉州有学校13所：“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小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馀未之闻。”当时，官办的有州学、县学，民办的有私学、书院等。据《四川书院史》^[7]统计，宋代四川各地建有书院29所，其中眉州有5所，眉山有2所：云庄书院，在眉州城南，眉州人史少弼嘉定四年（1211）建；北园书院，在眉州北郊，是曾任知眉州的李埴于宝庆二年（1226）以前建。

眉山不仅学校众多，而且学子众多。苏轼《道士张易简》^[8]说：“吾八岁入小学……童子几百人。”《众妙堂记》^[9]说：“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一



所蒙学学校，学生竟有百人。苏轼13岁时，与弟弟苏辙到眉山城西的寿昌院上学，师从州学教授刘巨。南宋晁公溯《今岁试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诗送之》在夸说眉州“饮食犹俎豆，佣贩皆诗书”之后，还歌咏了当年州里举行解试的火爆场面：“白袍五千人，崛起塞路衙。入门坐试席，正冠曳长裾。”一州四县就有五千人应试，教育规模之大，真是不可想象。

眉山进士群体的出现，还与家庭教育紧密相连。《方輿胜览》卷五三《眉州》“事要”引《修桥楼记》说：“其（指眉州）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描述了众多眉山学子在家中挑灯夜读的情景。父母们不仅用科举及第的理想来激励子弟，而且身体力行，教育指导子弟读书作文。如苏轼兄弟除了在学校上学外，在家中则是由父亲苏洵教他们读书作文，苏洵

在外游学，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又担起教育两个儿子的责任。

（二）主观原因

先天下之忧而忧 宋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与实践，继承着先秦两汉以来“士不可不弘毅”的精神，普遍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眉山学子“通经学古”，一直延续着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加之“三苏”等人的榜样作用，眉山学子普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致君尧舜”的文化心态，这是他们勤奋学习、博取功名的内在动力。

书山有路勤为径 据《宋史》^[6]记载，淳化年间进士朱台符“好学，敏于属辞”。宝元年间进士石扬休“少孤力学”。嘉祐年间进士苏轼、苏辙兄弟，自幼就“奋厉有当世志”，勤奋地读书作文。元丰年间进士任伯雨“自幼，已矫然不群，邃经术，文力雄健”。元祐年间进士（制科）王当“幼

好学，博览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绍圣年间进士任谅“力学自奋，年十四，即冠乡书”。淳熙年间进士任希夷“少刻意问学，为文精苦”。正是因为有众多学子的勤奋学习，才出现了眉山进士群体。

参考文献：

- [1]王存,元丰九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眉山市东坡区党史方志办公室内部资料《眉山县志》(民国十二年版校注本),2008。
- [3]眉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眉山市人物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3。
- [4]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 [5]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6][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7]胡昭曦,四川书院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吊儿郎当』第一人

□ 陈学林

四川流传一俗语“吊儿郎当”，用以形容人游手好闲，做事草率轻忽、放荡不羁的样子。“吊儿”是指风铃。“郎当”本指衣服宽大貌，古时木偶戏的服装往往显得宽大，穿上之后活摇活甩的，因此“郎当”一词被用来形容人不太正经，颓唐、潦倒、马虎。

这个俗语的由来，与唐明皇李隆基有莫大的关系。

“三郎郎当”的故事，在宋代早已广为流传。宋代罗大经撰的《鹤林玉露》记载：“魏鹤山《天宝遗事》诗云：‘红锦绷盛河北贼，紫金盞酌寿王妃。弄成晚岁郎当曲，正是三郎快活时。’俗所谓‘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说载，明皇自蜀还京，以驼马载珍玩自随，明皇闻驼马所带铃声，谓黄幡绰曰：‘铃声颇似人言语。’幡绰对曰：‘似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也。’明皇愧且笑。”

魏鹤山，即魏了翁，号鹤山，四川蒲江县人，南宋时著名的学者。罗大经，江西吉水县人，博极群书，《鹤林玉露》是部闲话文人士大夫轶事的笔记文集。



唐明皇李隆基

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小名“三郎”，英武有权略，多才多艺，喜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善书法，庙号“玄宗”。因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亦称为明皇。李隆基是历史上著名风流天子，被后代戏曲界尊奉为祖师爷，一些戏班甚至把他视为开山祖而立牌位，供香火，向他顶礼膜拜。开元十一年（723），宫中排练大型歌舞《圣寿乐》，他也穿上舞衣，亲自排练调度，并对他人加以鼓励，说：“好好练，莫辱三郎。”天宝年间，李隆基贪恋美色，沉迷音乐、歌舞，终酿成安史之乱。天宝十五年（756）六月，李隆基仓皇逃离长安直奔四川，途中杨国忠被乱刀砍死，杨贵妃被缢死马嵬坡。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十月，肃宗遣啖廷瑶入蜀奉迎李隆基回京。明皇一行，途经梓潼，遇雨，风过铃响，黄幡绰对曰“三郎郎当”。

黄幡绰，甘肃武威人，李隆基的宫廷乐师，入宫30多年。擅长“参军戏”，性格幽默、善口才。他曾经用滑稽风趣的语言，谏劝李隆基不要轻信安禄山，应疼爱自己的儿子，提醒李隆基注意安全，不要在马上打球摔坏了身子，深得李隆基赏识和信任。在梓潼黄幡绰对“三郎郎当”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想借“郎当！郎当！”的风铃之声对李隆基进行讽谏，希望他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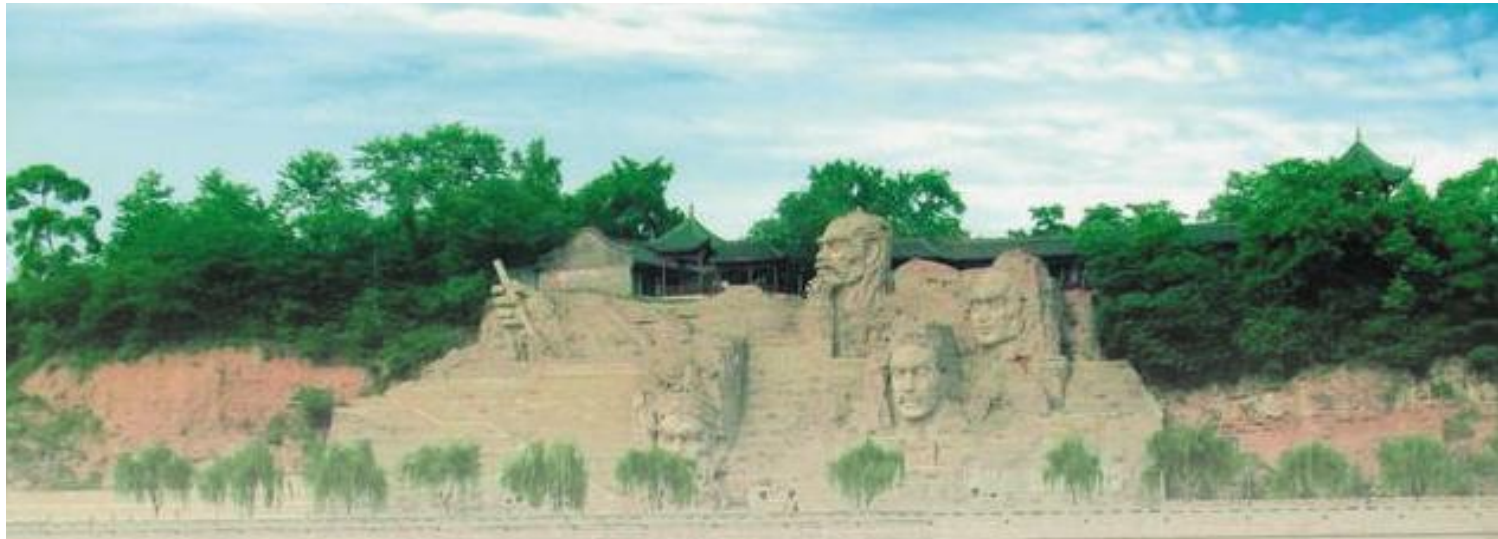
变精神状态，以国事为重，振作起来。用“郎当”批评人自唐即始。任半塘先生解说此语道：“‘郎当’叠句，从铃声来，既志三郎此行狼狽，复行其馱载珍玩累赘，失大贪小，恬不知愧，刺之深矣！铃声一路不绝，经此点破，将声声刺耳，直抵长安。语虽止而锋自锐，铃虽远而韵犹新，真古今第一妙讽。”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宦官李辅国诈传圣旨，奉兵幽禁太上皇李隆基于西内甘露殿。李隆基从此一病不起，渐入膏肓。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李隆基在愧疚与悔恨中崩于神龙殿，享年78岁。随着一代风流天子李隆基的死去，大唐王朝从此日薄西山，一蹶不振，一步一步走向了灭亡。

清人学者王士禛在他的文集中写道：“蜀道有郎当驿，即唐明皇雨中闻铃声处，予丙子岁过之，题诗驿壁云：‘金鸡赐帐事披猖，河朔从兹不属唐。却使青骡行万里，三郎当日太郎当’”。今四川梓潼翠云廊内，存石碑一块，碑高2.6米、宽0.86米、厚0.18米。正中阴刻正楷“唐明皇幸蜀闻铃处”八字，字径0.3×0.2米。碑石侧题：“大清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仲夏知梓潼县事昆明桂梁材立”。碑座长1.5米、宽1.2米、高1.5米，碑下是一形似乌龟的碑座。清咸丰八年《重修梓潼县志》载：“上亭铺县北四十里，唐明皇幸蜀，至此闻铃声，似言三郎郎当者，故名郎当驿。”缘此典故，清人在唐明皇曾经驻足之处郎当驿（上亭铺）立“唐明皇幸蜀闻铃处”，以鉴来者。清代《梓潼县志》中收有两首题郎当驿的七绝，其一“谁闻铃响似三郎，玉辇曾经古驿旁，千古伤心黄土尽，开元盛事最凄凉”；其二“鞭蓉小花管箫鸣，诏进霓裳别调情。底事乌啼花落后，却来驿路听铃声”。

“吊儿郎当”的典故出自唐明皇李隆基的故事，他是当仁不让的“吊儿郎当”第一人。

（作者单位：蒲江县史志办公室）



李调元及其方志思想

□ 熊 倩 曹鸿浙 罗一洋

李调元生平事迹

李调元（1734—1802），清乾隆时期巴蜀著名文人，历史学家、艺术家、教育家、文献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者及藏书家。字羹堂，号雨村、童山、鹤洲、蠡翁等，世居罗江县北南村坝。从小天资聪颖，加之家学渊源，5岁即诵读“四书”、《尔雅》，7岁即能应答巧妙。青年时期更是才华横溢，工于文章书画，“与崇庆何希颜、成都张鹤林、内江姜尔常、中江孟鹭洲、汉州张云谷，以文章著于时，时称‘锦江六杰’”。^①后经科举考试入翰林院，一生曾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兼文选司、翰林院编修、文选司员外郎、广东副考官、直隶通永道等官职，为人正直，不为权贵，为官清廉，后因护送《四库全书》遇雨书被黄箱沾染而获罪，深感仕途艰险，遂与官场决裂，“笑傲山水、潜心著述”。李调元不但藏书丰厚，而且一生著述范围广泛，内容庞杂，涉及经史子

集、语言文字、音韵戏曲、地理民俗、碑刻博物等。他耗尽一生精力，构筑囊括150种著述在内的《函海》；独立编纂了《罗江县志》《通州志序》等方志著作，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方志思想。

李调元主要方志思想

方志即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或特定事项的书籍文献。作为绵州罗江人，生于斯，故于斯，李调元独立编纂的《罗江县志》是全面了解罗江社会生活万象的主要参考书，也体现了他主要的方志思想。

明确的修志思想 修一方之志须有明确的编纂思想，李调元编纂县志首先是源于父亲李化楠的影响，他曾在《罗江县志序》中说：“罗江县旧无志，乾隆九年邑令秀水沈公潜延余先君石亭公纂修。”李调元的才学很大程度上直接来源于家庭的影响，他想修补父亲

的《罗江县志》，有继承父志的意思，在《童山自记》中云：“罗江县志，先君所作……思以继先君也。”

然而修志不是对前人的简单重复和继续，要对前志有所继承并有所发展，这也是李调元着重贯彻的修志思想。他发现由于兵荒马乱，很多书籍无法考证，很多名家著述也来不及细访，重新考订修补旧志就成为了一种必要，按照李调元自己的说法即要“继前志而补前缺”。加之卸甲归田之后，感到自己时间不多，如果不能很好完成这个工作，心里恐不安宁，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他完成方志的重要思想动力。

同时，李调元在《童山自记》中云：“绵州自移并罗江后，向未有志，此乃拟作州志稿本。”可见，他修订编纂《罗江县志》也是希望能为绵州方志的编修积累基础素材，这种修小志为大志打基础的修志思想非常明确。

充分的修志准备 良好的

家庭教育和家学背景使得李调元从小就喜好读书、抄书和藏书。5岁就开始背诵中国传统经书，青年时期即写得一手好文章，堪称“奇才”，在乡试中，提学史“奇其才……拔第一。”从他留下来的庞杂的诗、文、论、赋、奏、序等各类文献来看，可谓洋洋大观，绝非凭借一时聪慧能写出来，而需要长时间大量的阅读和学习方可。中进士在翰林院期间，正是乾隆下诏修订《四库全书》之时，作为参与人，他有幸看到很多坊间难得一见的皇家的“天府藏书”，“采遗书，开四库，于是人间未见之书骈麋至。”这些难得的巴蜀文化书籍为他进行方志的写作打下了宝贵的基础。

作为学者，李调元父子尤其喜好藏书，遇到好书总是倾其所有购得，外出也不忘从外地购回许多珍贵古本、稀见图书，以充实馆藏。在做官期间，“所得俸，悉以购书”。“万卷楼”就是李调元为了振兴巴蜀文化，集平生精力而经营的一座藏书楼，藏书之多，为西南藏书第一家，也可说是当时四川最大的私立图书馆。李调元的老家“醒园”在今罗江镇北二十里的云龙山下，山青水秀，树木葱笼，“万卷楼”就高矗其中。^[2]李调元有抄书之癖，凡家中所无之书，即借别人所藏图书抄写。他作京官时曾如饥似渴地广抄大内藏书。其藏书中，“御库抄本，无

一不备”。自刊而藏是李调元“万卷楼”藏书中的另一部分。他对刊刻前人著作极有兴趣，22岁时就自刻了《李太白集》，以后几乎刻书不断。他的《函海》《续函海》《童山诗集》《童山文集》均有自刻本。嘉庆五年（1800）刊刻的《函海》丛书，收书152种，大部分为川蜀先贤著述。分30函，一至十为晋至唐、宋、元、明诸人未见之书；十一至十六，专刻明代杨慎所著之书；十七至三十，为自著之书及各家已刻而流传不广的书籍，有诗文、史论、音训、剧话、曲话、词赋等，其中有关音韵、民歌、俗谚最有价值。自归乡之后，李调元有志于收集巴蜀乡邦文献，藏书达10万余卷。除保存古版经典外，其他书籍广泛借阅，以奖掖后进为己任。编书目《西川李氏藏书簿》10卷，分经、史、子、集4门。另编有《万卷楼藏书目录》和《贗书录》。所藏书后为和珅党羽借白莲教起义军之名所焚。著有《童山文集》《雨村诗话》《蠢翁词》等，辑《全五代诗》、民歌集《粤风》。另有《诸家藏书簿》《诸家藏画簿》各10卷。如此规模的藏书，李调元本人也很自豪，其诗云：“我家有楼东山北，万卷与山齐嵯峨。”

游历山水是文人普遍的一个爱好。李调元对巴蜀大地的山川名胜、寺观僧道、文物古迹、民俗风情、饮食园艺都留



下众多的记载。他在游览名胜古迹的时候，亦不忘做好记录，一时一地的风土民俗、山川地貌、名胜古迹以及碑刻金石等无不随时记录下来，这些实地考察的资料为其日后方志的写作提供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乾隆五十五年，李调元撰写30卷的《梓里旧闻》成为其编修《罗江县志》的底本。

严谨的修志态度 李调元撰写《罗江县志》历时三年，是其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但是绝非仓促随意制作，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严谨的考证、实事求是。李调元生活的时期正是清代“小学”盛行时期，清人重整“汉学”，尚汉学中的“古文经学派”，重视理据的考证，尤其是利用金石材料的考据，致力于文献的考据。在方志的写作上，强调要注意方志体例的完备，内容的广博，材料的详实，做到有理有据。这些严谨、求实、审慎的治学风气都影响着李调元的方志写作。这种“征而有信”的态度也贯彻在他的《罗江县

志》写作中，“如四乡门北乡上，关于三清观的记载，‘按万历总志，二里有三清观，今亦无考，或企仙亭。’关于绵阳误作沔阳的解说，‘按绵阳江，即蜀都赋所谓浸以绵洛也，蜀地名绵阳皆因之，有误作沔阳，非也，沔在汉中。’李调元在每有考证之处，采取低于正文二格的形式，既有别于正文，又有别于诗词，以便查阅。”^[1]

在修志时根据一地一方的历史现状的真实情况进行，既不缺漏，也要补前志所没有，不依个人旨趣爱好随意取舍，不夸大，不缩小，实事求是，有根有据，论述客观公允，既要考，又要辩，还要证。李调元在编写《罗江县志》时广征博引，大量引用各类材料，如《升庵记》《文献通考》《晋书》《明史》《太平寰宇记》《剑南记》《九州春秋》《华阳国志》《四川通志》《大清会典》《四川总志》《蜀陇余闻》等，看到的材料还要进行辨析，防止以讹传讹，如方志中引用了一些碑刻材料，这些碑刻都是李调元亲自拓印，“山巅水崖，凡有半碣残碑，自明以上者，莫不手自摹拓。”^[4]

创新的修志方法 方志的编纂由来已久，其编纂体例、方法、原则等也有一贯的做法。在编纂体例上，李调元敢于打破传统设立人物、风俗、城邑、传记、学校、祠堂等体

例，大胆进行创新，他开创了城内门和四乡门即东南西北四乡两门，在这两门下又涵盖传统方志门类，《罗江县志》十卷，补遗一卷，卷二是城内门，卷三到卷八是四乡门。这七卷是所谓的综合叙述，之后又有传统的门类，这样的处理便于快速查找某个地域的情况，简单明了。另外，“一景一艺文”，即没有传统的艺术志一门，而是随景附设艺术志，一一对应，做到景与艺文互相对应结合，并且将艺文放在低于正文一格的位置，方便读者查阅对照，“如在写到文笔山南塔时，低于正文一格，将知县孙志祖写的重修南塔记附于其后。在写到蓬莱坊时，低于正文一格，将明丁宇耀《蓬莱坊修道记》附于其后，做到了景与艺文的结合，便于查阅。”^[5]

李调元方志思想的影响

作为清初著名才子学者，经历战争浩劫，百废待兴，李调元有着知识分子均具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其一生涉猎广博，在很多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方志学领域，他认为：“身为民牧，而今一州之山川，风土，物数，方名，若隔膜而不相知乎”^[6]，作为一方之百姓，应对当地的风土人物、民情风俗等地域情况有所了解，在方志的编纂上首先要承前人之志，又要补充前人之志，启发后人，要有承前启后

的桥梁作用。另外，李调元打算编修罗江地方志的时候，由于战乱，文化遭受严重破坏，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也来不及仔细研究名家著述，他感到这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时期，修志工作势在必行，它不但可以保存现世历史，还可以“资政、教化”，为当地政府治理一方、教化当地百姓、普及当地知识提供材料和依据。

李调元本着明确的修志思想，进行了充分的修志准备，以严谨的修志态度采用创新的修志方法，其所修的《罗江县志》为保存罗江本地资料，后世了解罗江乃至绵州四川，进行巴蜀文化研究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史料，也为方志的撰写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为巴蜀文化的弘扬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学君,张莉红:《非常之人与非常之功——李调元生平述论》,文史杂志2007年第4期。

[2]李调元:《函海序》,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85。

[3][5]旷天全,卢霞:《李调元方志思想研究》,四川省地方志论文选,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地方志协会编,2011.3。

[4][6]李调元:《罗江县志序》,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85。

(作者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黄辉与公安三袁

□ 靳滇霞

黄辉，字平倩，一字昭素，号慎轩，无知居士，四川西充县走马场人。史称黄辉“刻意学古，一以韩（愈）、欧（阳修）为师，自是馆阁文稍变”，对明代文学改革及公安派的兴起都有重要的作用。黄辉与公安三袁交往密切，共同推进了公安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黄辉与袁宗道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明荆州府公安（今属湖北省公安县）人。黄辉与袁宗道相识相交于同官翰林时期，思想上的契合，使得他们不仅仅是同为馆臣的同事关系，更是站在反对拟古主义思潮这一战壕里的亲密战友，而葡萄社的聚会则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情谊，变得亲密无间。

万历十四年（1586），袁宗道中会元，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十七年（1589），黄辉中进士，次年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时王、李之学盛行，翰林院受到很大影响，“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两人同为翰林院馆臣，思想相

通，逐渐成为好友。

“伯修在词垣，当王、李词章盛行之日，独与同馆黄昭素，厌恶俗学，力排假借盗窃之失。于唐好香山，于宋好眉山，名其斋曰白苏，所以自别于时流也。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排实自伯修发之。”钱谦益在此段描述中已经表明，“公安一派”是由袁宗道发起的，而黄辉与袁宗道早已就反对拟古主义达成了共识，自成一派。黄辉以韩愈、欧阳修为师，来反击“七子”的“文必秦汉”，袁宗道则以推崇白居易、苏轼来对抗“七子”的“诗必盛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嘉靖七子之派，徐文长（徐渭）欲以李长吉（李贺）体变之，不能也。汤义仍（汤显祖）欲以尤（袁）、萧（德藻）、范（成大）、陆（游）体变之，亦不能也。王百谷（穉登）、王承父（叔承）、屠长卿（屠隆）虽迭有违言，然寡不敌众。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道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派盛行。”黄辉、袁宗道都对拟古主义思潮不满，是反对拟古主



袁宗道

义这一战线上的战友，思想的一致性，使得两人交往更为密切，为二人深厚的友谊打下了基础。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三袁于北京崇国寺发起葡萄社。黄辉是该社的主要成员之一。黄辉与袁宗道在葡萄社期间关系逐渐密切，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谈禅、作诗，进行学术、思想上的交流，感情亦越来越深厚。“己亥（万历二十七年，1599）、庚子（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间，楚人袁玉蟠太史（袁宗道）同弟中郎（袁宏道），与皖上吴本如（吴用先），蜀中黄慎轩（黄辉），最后则浙中陶石簣（陶望龄）以起家继至，相与聚谈禅学，

旬月必有会，高明士大夫翕然从之。”葡萄社的聚会内容与时政并无多大关系，基本上是谈禅、作诗。“至则聚谈，或游水边，或览贝叶，或数人相聚，问近日所见，或静坐禅榻上，或作诗，至日暮始归。”

万历二十八年（1600），黄辉升任右谕德，袁宗道升任右庶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袁宗道于九月猝然离世，黄辉悲痛不已。由于袁宏道、袁中道两兄弟均在八月离京，黄辉便亲自料理了袁宗道的后事，事无巨细，尽心尽力。“初，伯修官京师，以庚子（万历二十八年）九月仓卒去世。中郎及予俱八月先归，区处后事，皆慎轩为之，尽心尽力，可无遗恨。”黄辉与袁宗道情谊深厚，以至于两年后，黄辉辞官归故乡，还专门绕道公安去拜祭宗道，并为其墓题主志铭。



袁宏道



黄辉行书七言诗二首

黄辉与袁宏道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吴县知县、礼部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郎中、国子博士等职。黄辉与袁宏道早年便已结识，交游逐渐频繁则是他们均在北京为官时期，葡萄社的筹建成为了他们交往的主要途径，为二人的深厚友谊打下了坚实基础。以至于后来，二人无论是出仕还是归隐，都没有再聚首，但却一直有书信往来。

黄辉与袁宏道相识相交，至迟应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初。是时，黄辉与宏道等人在北京出游，袁宏道在与袁宗道的书信中有提及“会王（图）、黄（辉）、顾（天垓）、萧（云举）四太史，为我致谢，云吴县有一无孔铁锤”这里的黄，应是说的黄辉。此为袁宏道在吴县时所写，而黄辉此时应在京师，与陶望龄、潘洙为本年会试同考官。袁宏道在吴县期间与黄辉并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只是在与长兄袁宗道的书信往来中有提及黄辉，也不过是代为问

候而已，而黄辉也没有到吴县看望他。

袁宏道在京期间，与黄辉交游逐渐频繁。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袁宏道出任顺天府教授。同年，袁中道被举荐入京，为国子监太学生。袁氏三兄弟齐聚京师。袁中道记录了当年的情形：“戊戌之冬，伯修、中郎皆官都门，予亦入太学。慎轩先生从蜀中来邸中，聚首甚密。”黄辉作为葡萄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与宏道交游甚密，或是相约在崇国寺葡萄园中饮酒，或是相约大慧寺登高，甚至于端午节也会聚集在一起谈禅、作诗，进行学识（术）和思想上的交流，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知己。黄辉受袁宏道的影响较大，在此之前，黄辉的诗文俱有名，在馆阁馆臣中，诗文推崇陶望龄，书画则是董其昌，而黄辉的诗书与他们齐名，不分上下。袁中道在《书方平弟藏慎轩居士卷末》云：“伯修诗稳而清，慎轩诗奇而藻，两人皆为中郎意见所转，稍稍失其故步。”万历二十九年（1601），袁宏道有了绝仕的意望，并寄诗黄辉



公安三袁

劝其退隐，相约黄辉于明年归隐玉泉山。但是，就在万历三十年（1602）春，借由李贽入京，发起了对士大夫学佛谈禅之风的抨击，即“排佛案”。黄辉在这起事件中受到较大波及，京城“憎黄尤切”。黄辉不得不辞职还乡，陶望龄也离京。袁宏道在家中闻得京城之变故，又写书信劝黄辉归隐。

黄辉在家期间与袁宏道亦多有书信往来，如《寄中郎书》《寄中郎、密脩书》。袁宏道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入京，在任职期间曾多次劝黄辉出仕，《与黄平倩》云：“近日燕中谈学者绝少，弟以是益闲……京师友朋虽少，强似家山万倍，清流胜士，时复一遇，若得仁兄与陶周望、苏潜夫俱集，其乐又不待言。”万历三十九年（1611），黄辉再次入京复职。

黄辉与袁中道

袁中道（1570-1624），字小修，号酸腐居士。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次年授徽州府教授，后升国子监博士，止于吏部郎中。黄辉与袁中道，交往时间最长，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黄辉与袁中道的交游，应是袁宗道在京为官期间开始的。不过，二人在这之前就已相识，黄辉对少年袁中道的诗甚是欣赏，对其诗作的高度评价，对少年袁中道有着激励的作用。

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中道陪同宏道入京就职，并在同年被选入国子监太学生。黄辉与中道开始了面对面的正式交游。他们或是初伏天相约于崇国寺葡萄园中饮酒作诗，或是到得胜门净业寺看水。在葡萄社期间，黄辉与宏道、中道三人结“莲社”，一心习佛，停止诗文的创作，造成万历二十八年（1600）后中道和黄辉的诗文都未曾留稿传世。

黄辉与袁中道在交往中，互相诗文唱和，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袁中道与黄辉交往甚密，经常到黄辉家中做客，得其书法作品也较多。“居都门时，每月率至其寓住十余日，得其书最多。”黄辉的诗书在当时早已有名，袁中道对其书法甚是推崇，“字法愈出愈奇，决当为本朝第一。”还称赞黄

辉书法“迺古柔媚，妙有灵和笔意”“黄平倩、董玄宰，真可追配古人。玄宰穷其法，平倩出己意穷其趣。”把黄辉与董其昌书法作比较，觉得各有所长，而黄辉书法似更具个性。黄辉也就书法问题指导袁中道，“作字当学运腕，不解运腕，字即无力。羲之爱鹅，政欲观其项间曲折之妙，非果癖之也。兄字有笔才，止是欠学力耳。”当时有人抨击黄书之弊，中道积极为之辩护，认为黄辉书法的妙处在于“篆籀气”，也就是巧用腕力。

黄辉年长于袁中道，是袁中道的长辈，更是其知己好友。袁中道也把黄辉当作亲人来对待，时刻关心着黄辉的近况。万历三十五年（1607），黄辉在蜀中病重，中道得到消息为之“惊叹者数日”，直到后来通过陶望龄的来信得知黄辉病已好转，逐渐康复，才放下下心来。万历三十九年（1611），黄辉复职入京。袁中道在失去伯修、中郎两位兄长后，黄辉是其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万历四十年（1612）黄辉离世，袁中道悲痛不已，甚至在与亲朋好友的书信中也多次提及黄辉的离世，可见中道与黄辉的友谊之深厚，以至于念念不忘。

（作者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研究生）

万重桑海 潜闭琴书

浣云公李鏞逸事

□ 李 斧



李鏞与长孙李尧枚

李鏞，号浣云，虽然生于四川，但因籍贯浙江嘉兴，按清制不得在四川科考。所以只能在故乡嘉兴捐得监生，候选县丞、候补知县出身。历任南部、宜宾、南溪知县。其中在南溪前后两任、将近十年。这在当时候补官员多如牛毛、知县通常只任一两年的常例下，也算是破格了。卸任后回成都定居。关于他的生平，其三子李道洋曾著《先府君行略》，惜佚已久。这里只讲述他的几个小故事。

表彰孝道

光绪十九年（1893），李鏞在南溪任上，所辖李庄镇出了一件事：某左姓青年外出谋生，染病亡故。所剩一弱妻、一婴孩、一老母在家。媳罗氏忍痛含悲百般照顾眼瞎身病、卧床不起的老母，并分出自己哺育婴孩的乳汁喂婆婆，一时传为美谈。后来，罗氏因在火灾中舍身救婆婆被房梁塌垮压倒烧死。其事迹被赞为“以奶乳姑”“以身殉姑”（旧时文言称公婆为舅姑或翁姑）。知县李鏞奏请朝廷旌表，却惹来秀才

的风言风语：既是善举，何无善报？致使这义妇坊的正联无人敢写。

李鏞找到了此时从资州回乡探亲的名士包汝谐。包汝谐应李鏞之邀，疾书一联：

孝道达重泉，乳姑而生，卫姑而死；
天经昭一炬，燃妇之骨，旌妇之心。

于是李鏞就把包汝谐这幅名联用在李庄镇会光寺左罗氏坊了。

这个故事原见于1985年的《龙门阵》杂志。查民国《南溪县志》，罗氏乃左世洪（又作“鸿”）妻。县志中并无左在外出中死去和“以奶乳姑”的记载，只载“姑杨氏老且病，日卧床褥。妇入门，奉事维谨”。而且“以身殉姑”发生在同治十三年九月（见《舆地》和《列女》），远在李鏞就职南溪十余年前。不过县志上也是一笔糊涂帐，经考证，这段历史脉络应该是：火灾发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左罗氏“始以身负姑，继以臂挡火”，殒年二十一岁。由于无谓的争议，此事被搁置。光绪十二年

(1886)后才由新令李镛详请旌表，继而筹资；十八年（1892）建坊，十九年（1893）落成。李镛邀请当时南溪本土最有名望的儒学大师包汝谐为左罗氏撰联，从而巧妙化解争议，进而详请旌表建坊，确实是这段历史中的亮点。

兴办教育

兴办教育的资金，长期以来除了府县学师能从财政“养廉奉银”中得到少量拨款外，主要经费来自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千奇百怪。致使“贫士以为诟病，师儒因之失尊，川中官绅久知其弊”。光绪十六年（1890）南溪知县李镛奉上宪札飭，实行改革，举办学田。他召开“县人会议”，借鉴“邻封江安和富顺两县办法，按租稳捐谷折银呈檄”，明确规定本县居民“止捐一次，后不再收”；外地“寄籍外籍（或）无业官绅商贾自愿捐者，又添收猪鳖，每支百文。一矣置业，租息数用，即行停止”；随即在十多个乡镇设置公业学田。从此教育经费

来源稳定，局面一改。

经费解决后，师资人才是关键。南溪自古人杰地灵，晚清名家甚多。除了包汝谐一族昆仲数人外，还有其师曾壁光一族。曾氏最出名当是曾鹤龄，曾在户部郎中任上对晚清发出“安不忘危，外宁内忧”的呐喊之声；名士陈科殿“少工制艺，才思敏捷。每制文周，庭行三百步，操笔立成”，乡试中举后“七赴礼闱不第”，仍课徒作文，努力不懈，为人清高耿直。李镛对其十分重视，全力延揽不果。“李镛幕友盛（《县志》原文误做胜）伯庚语人曰：县尊以礼为罗，罗南士（南溪名士之简称）几罄。惟陈君清介拔俗，如云间翔鹤，非俗网所能罟罟也。”这也是一段趣事。

李镛任职期间南溪学子表现不凡，其中曾继光先中解元（乡试第一），继中进士。他是南溪光绪年间高中的唯一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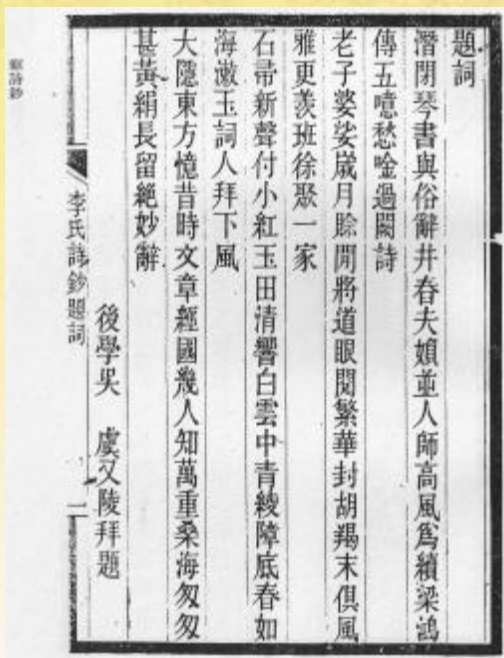
广集字画

李镛一生喜好字画，收藏甚丰，其中包括大量名画。李镛藏有一本12开大的石涛花卉册页[石涛（1642-约1707），法名原济（又作元济），字石涛，又号苦瓜和尚，被誉为中国画一代宗师]，价值不菲，爱不释手。民国初年被四川大军阀王瓚绪以大洋五千块强行买去，后来被四川维新名士杨啸谷带来的两名美国教授以黄金二十条买走。虽然价格不低，王瓚绪还是万分感叹“东西太可惜了，哪里去寻求第二本？”（《四川文史资料》）。

又如王宸（1720-1797），字子凝（又作紫凝、子冰），号蓬心（又作蓬薪、蓬樵），晚署老蓬仙。王时敏六世孙，王原祁曾孙。与王玖、王愨、王昱合称小四王。著有《绘林伐材》《蓬心诗钞》，《寒林图》是其高龄七旬时临摹的一幅名画，纸本镜心，72×44公分，近三平尺。蒯善于1930年从李浣云后人手中得此画并在裱



寒林图



吴虞题词

边题有长跋，后流传法国，曾被高价拍卖。

如《寒林图》一样，李鏞的那些名贵字画多在他身后失散。作家李劫人1962年在给李鏞的七孙子李西舫的回信中就说到李西舫托卖五幅字画，包括乾隆帝师张得天小品梅石条。此时的托卖不过是贱卖，要价才二十元，有意者只还价十五元。

结交名士

李鏞自光绪二十年（1894）卸任南溪知县，从此定居成都。他结交各类朋友甚多，其中包括其时名噪西蜀的“五老七贤”。

《益州书画录·附录·宦游》云：“王永言，号咏斋，字东生。县籍不详。工小篆，能诗。与李浣云、邓奕潜交情甚笃，诗酒唱酬，几无虚日。”王永言乃李鏞侄李道江之岳舅，邓奕潜则为李道江之岳父。邓奕潜是江苏无锡人，宦蜀已久。他不仅擅长诗画，而且精通围棋。与鲍鼎、王存善、黄绍箕并列为清末民初四大围棋棋谱编撰家，其编撰的《弈潜斋集谱》是一部大型综合性围棋汇编，也是他若干围棋书之代

表。

李鏞结交名士，尽管多数是传统保守的朋友，可是他也不排斥“另类人物”。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名将吴虞，李鏞父子几人与他诗词来往，过从甚密。《吴虞日记》中记叙着他与李鏞父子的密切来往，如“（丁巳一九一七年二月）十日（期）六晴。是日晤方和斋、李浣云、邓雨人、邹怀西、杨宝森、熊菊人、邓纯丰、钱叔元、谢保生诸人，碧秀演《拐魁》、《挡幽》、《桂香阁》三出，得赏二十六元，余亦赏渠四元故也。”“（丁巳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日）发玉叔、安澜信及词（前一日作《望乡人调》），并索方和斋、李浣云、李亮卿和。”“（戊午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四）十六晴折订《悼亡诗》。令老王送余啸风、刘培之、胡安澜、张星平、胡玉叔、胡玉津、杜柴扉、何雨辰、方鹤叟、李浣云、李澄波、唐特风、江子愚、张梦余、孙少荆、张幼鉴、王云裳、康千里处《悼亡诗》。”日记中多次提到的“方鹤叟”即是成都昔日著名的“五老七贤”之首方旭，字鹤斋。“方和斋”为“方鹤斋”之误。邓纯丰就是前文中提到的邓奕潜。李亮卿即为李鏞之三子李道洋。

吴虞还为李鏞之家的《李氏诗词》题诗：“潜闭琴书与俗辞，井春夫嬾并人师。高风为续梁鸿传，五噫愁唸过阙诗。老子婆娑岁月賒，闲将道眼阅繁华。封胡羯末俱风雅，更羨班徐聚一家。石帚新声付小红，玉田清响白云中。青綾障底春如海，漱玉词人拜下风。大隐东方忆昔时，文章经国几人知。万重桑海匆匆甚，黄絹长留绝妙辞。”

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退休后的李鏞退出“万重桑海”，开始了“大隐东方”“潜闭琴书”的生活。



中国历史上的 党争之祸

先秦至清末，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次影响深远的朋党现象。历朝历代党派与党派之间、党派与皇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从一个独特角度揭示了中国各个王朝的盛衰规律，惊心动魄地展示了制度压抑下人性的挣扎和扭曲。

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高官争权的现象，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牛李党争使本来腐朽衰

落的唐朝走向灭亡。

政治上，唐后期，则天朝的高压政策使“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至天宝年间，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进一步丧失。这就为以后牛李党争提供了前提。

经济上，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出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这些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同时，唐太宗时“民主”遗风的丧失使个人争权夺势斗争肆无忌惮，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个人权势更加膨胀，更加冲撞激烈，对牛李党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军事上，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

北、西北、西南等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起初，中央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最后整个官场成为官僚、宦官、藩镇将领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成为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宫廷方面，唐宦官势力的膨胀，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牛李两党背后都有宦官在支持。所以，牛李党争是宦官权势之争的一种表现，宦官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则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朝廷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对策时痛诋时政，被考官评为上第，请予优叙。当时宰相李吉甫（德裕之父）大为不满，向宪宗陈诉，并称他们与考官有私。宪宗听信李吉甫的话，将考官免职贬官，牛僧孺等三人也不予重用。事后颇有人上疏为牛僧孺等鸣不平，指责李吉甫忌贤抑才，形成舆论压力。宪宗又于同年出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初步形成两派对立的形势。元和年间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藩镇割据。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主张武力平叛；另一派宰相李绛、韦贯之、李逢吉主张安抚妥协。由



牛僧孺

于宪宗和当权宦官吐突承璀支持前者，因此元和年间主战派得势，反对派则利用舆论与之抗衡。李吉甫死后，主战派的中心人物是裴度，反对派的中心人物是李逢吉。当时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都还在朝外为官，地位也不高，对朝内政争影响不大。而在朝两派的争论还以政见为主，派系私利的性质不明显，故元和年间只是党争的酝酿时期。

长庆元年（821），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譔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皆说段文昌所揭发是实情。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于是，李、杨等大为怀恨，从此“德

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双方各从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

此后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除去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前夕，牛李两党都被当时掌权的李训、郑注排斥朝外，大体上是两党交替进退，一党在朝，便排斥对方为外任。开成五年（840），文宗死，牛党和他们依靠的宦官所支持的继承人未能继位，另一派宦官拥立唐武宗即位，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为宰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牛党被排斥出朝廷之外，其领袖牛僧孺、李宗闵虽然早已身在外地，也被贬职流放。李德裕虽有政绩，但其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但为反对派所憎恨，也为宦官所不满。会昌六年（846）宣宗即位，即贬之外任，李党纷纷被斥。牛党的令狐绹、崔铉、魏扶相继入相，牛僧孺、李宗闵也被召还朝（李宗闵不及还朝即死）。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死于贬所。牛李两党之争终于以牛党获胜结束。

牛李党争对唐代政局有一定的影响，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导致社会各种矛盾也开始趋于尖锐化，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

蜀洛朔党争

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

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是由多种政治力量暂时结合而成，如洛蜀朔三党，对政事的看法和主张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只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走到了一起，在维护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被驱除出朝廷后，他们便不能相安于一朝，内部掀起了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别斗争，这就是“蜀洛朔党争”。

洛阳人程颐以布衣之士为司马光、吕公着汲引至政府，并以崇政殿说书之职担任宋哲宗的老师，对这个十岁的小皇帝，程颐“每以师道自居”，除灌输儒家正统思想，还要小皇帝不近酒色，连司马光等也觉得未免过分。司马光死后，朝臣们藉朝贺大赦的机会，去吊唁司马光。程颐认为不可，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哪能“贺赦才了”就去吊祭！人们不同意这种迂腐之论，而苏轼讥笑说：此是枉死市上叔孙通制订的礼，而不是孔夫子的礼。众人无不哄然。程颐的弟子朱光庭、贾易等所谓洛党，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仁祖之忠厚”则官吏们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又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藉以攻击苏轼诬蔑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应予治罪。蜀人吕陶、上官均亦即所谓蜀党，不肯坐视苏轼所受排击，上章论列朱光庭借机为程颐泄私忿。无所偏袒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

庭的奏章太过分；而侧身于朔党的王岩叟则支持程颐。洛党和蜀党积不相能的结果，苏轼离开了政府，程颐也罢崇政殿说书。两党两败俱伤，以刘摯、梁焘等北方人为首的朔党控制了政府，成为司马光保守派的真正继承者。随后，朔党又同吕大防发生矛盾，权势之争，愈演愈烈，而一些投机分子如杨畏之流又交斗其间，政治局势更加混乱，最后经受不了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打击，完全垮台。

东林党争

东林党争是指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以及其他派别之间的斗争，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人为主的政治集团。在东林党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

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万历三十二年（1604），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同时期的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以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的齐党

皆依附于浙党，合称“齐楚浙党”，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昆党。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与东林党人相互攻击，“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鑴、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

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

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万历四十五年（1617）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泰昌元年（1620）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启用。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

天启三年（1623）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宣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明熹宗时，政治极度腐败，许多东林人物被迫害致死，朝野忠良尽去，还殃及边防将帅。明思宗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东林党在崇祯初年暂时抬头，袁崇焕被处斩后，东林党的声势又告衰落，皇帝最后只能信任宦官，阉党势力复起。

明万历朱翊钧因为立储一



刘摯

事与大臣反复较量，最终虽屈服于众意，竟置江山社稷于不顾，深居后宫不问国事达三十年之久。期间，朝政为东林人把持，齐楚浙党一时走投无路，大多投靠魏忠贤门下。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之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是好友。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硬是闭门不纳，逢人便说“见泉无子”，魏广微深恨不已，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阮大铖打击东林党人向来不遗余力，当时史可法与东林党人力主拥立潞王，马士英却抢先拥立福王。史可法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两难。《桃花扇》记载阮大铖刻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沈昆铜、沈眉生等人，结果反被责打一顿，后来阮成为南明重臣，立刻展开报复行动。

永历朝又有所谓吴楚党争，是瞿式耜与广东军阀李成栋、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博之间的斗争。吴楚党争使得南明与大顺军、大西军的战力始终无法整合，最后亡于清军之手。

到了清初，还隐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顺治时期冯谗（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与陈名夏（东林党之后）的北党与南党之争。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

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帝党后党之争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战争发生时，清朝统治者围绕主战与主和，展开了激烈的帝后党争。朝廷的许多官僚从各自利益出发，分别集中于慈禧与光绪的周围相互攻讦，争斗不已。后党以顽固派为骨干，内有李莲英，外有奕訢、孙毓汶等；洋务派头子李鸿章也倾向后党，他权力很大，一人独当军事外交之冲。帝党的中坚是翁同和，他既是光绪的师傅，又是户部尚书；文廷式、志锐、张謇等号称清流的人物，也属帝党。他们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对形势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革新政治。但他们大多没有实权，只是对慈禧的内外政策深为不满，支持光绪掌握政权。

面对日本猖狂的战争挑衅，帝后党态度迥然不相同。帝党主张“有争无让，事在不疑。”光绪接连发布上谕，要北洋“厚集兵力”“不可意存轻视”。而后党所担心的是战争会削弱他们的最高统治地位和军事实力，慈禧更害怕战争会冲击她的万寿庆典。因而她极力反对



抗战，支持李鸿章屈辱求和。而李鸿章则被侵略者的炮火吓得如同惊弓之鸟，更忧虑战争会削弱淮军和北洋海军，造成自己地位下降，因此力主避战求和，要前线清军“静守勿动”，等着挨打。后党的阻挠措施让光绪帝在清统治集团中陷入孤立地位，新旧势力的斗争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

清末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始终把持朝政，掌握着清王朝的大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他们甘心逢迎外国侵略者，不惜卖国求荣。而帝党的变法措施，势必触犯后党的利益，变法失败也就成为了必然结局。同时，清政府上层的帝后党争及其结局，也成了导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本刊摘编。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历代党争史》，王桐龄编著）

整治“庸懒散浮拖”凝心聚力促发展

1月20日，省志编委再次召开“庸懒散浮拖”专项整治专题座谈会，对照省委要求，回顾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查找自身存在问题，明确提出下一步的改进纠正办法，从领导干部抓起，从自身做起，以实际行动切实做到“治庸提能、治懒正气、治散聚力、治浮定神、治拖增效”。

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委机关“庸懒散浮拖”专项整治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他指出，要将“庸懒散浮拖”专项整治活动贯彻地方志工作的全过程、全领域，一要讲学习、树正气。打牢思想基础，做到学用结合，加强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和党性修养锤炼。二要讲政治、守纪律。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政纪律，克服本位主义思想，重沟通、重协调。三要讲责任、重担当。要为官能为，为官敢为，为官善为，积极进取、主动作为。四要讲实干、重落实。通过转变思想、提高认识，积极落实整改。

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建议在“四个进一步”上狠抓落实。一是要进一步认识专项整治的历史背景，严防“为官不为”“无功即是过”的错误思想。二是要进一步剖析思想根源，分析查找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方面存在的问题，严防“与己无关、法不责众、得过且过”等错误认识和侥幸心理。三是要进一步突出重点，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突出问题为靶子，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使整治和克服“庸懒散浮拖”成为日常状态。四是要进一步落实整改，真正建立从严管党治吏长效机制，实现整治目标。

(黄 绚)

中指组领导来川调研《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制图工作

1月20日，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执行主编邱新立一行在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陪同下前往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会商《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地图选用制作事项。双方就《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地图制作进行深入研究，并达成加快进度、保证工期、制出精品的一致。

邱新立通报了《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工作进展情况，强调全书制图工作的重要性，代表中指组办公室和国务院《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对四川省委省政府、省直各部门、四

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对编纂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马小彬在讲话中感谢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对四川地方志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下一步四川地方志编纂中如何使用测绘部门制发的规范地图与其达成初步协作意向。

(陶利辉)

省地方志学会召开七届四次（在蓉）常务理事会议



1月21日，四川省地方志学会七届四次（在蓉）常务理事会议在成都召开。会长马小彬和副会长王孝平、汪毅、高志刚、黄丽、夏建平及其他在蓉的常务理事出席会议。会议由王孝平主持。

会议评议了全国地方志系统第三届年鉴质量评比四川推荐项目，原则确定了推荐年鉴名单；研究了学会七届四次理事会筹备工作，对七届四次理事会议程、有关人事调整进行审议；对学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稿、2015年度工作要点稿提出补充修改意见。

马小彬对学会2015年工作提出要求：一是积极做好四川省第八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补充完善学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稿、2015年度工作要点稿；二是要拓展学术研究范围，营造学术研究氛围，配合中指组做好《中国名镇志》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继续推动地方志理论研究课题活动，制定《年鉴工作规范》《信息化工作规范》。学会工作任重道远，各会员单位和全体会员要齐心协力，努力提高方志工作的研究水平和业务水平，推动地方志事业向前迈进。

(张 华)

《四川抗战历史文献》编纂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召开

1月21日，《四川抗战历史文献》编纂工作座谈会

在成都召开。会议传达了省政府主要领导关于编纂《四川抗战历史文献》的批示精神，介绍了编纂《四川抗战历史文献》及其筹备工作专家座谈情况。与会领导、专家通报了本单位和相关单位收藏、整理抗战历史文献及其抗战历史的研究情况，并就编纂《四川抗战历史文献》发表意见。

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就前期方案制定、经费预算、体量设计等事项进行说明，对编委会、专家组的组建、责任分工、大纲制定、资料收集等作出安排部署。他指出，编纂《四川抗战历史文献》采取课题制形式，编纂体例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等分类；资料选取既要见人见事，又要保存重要史料价值，既要讲究政治原则，突出四川贡献，又要处理好四川与陪都重庆的关系、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实物与照片的关系、“三亲”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的关系；建议有关厅局近期联合发文对全省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方志馆（室）所藏抗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摸底，在收集资料、编纂工作中资源共享，共同推进编纂工作。

省志编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建议编纂《四川抗战历史文献》应做好四项工作：一是“摸底子”，分行业、分单位做好资料摸底工作；二是“搭班子”，专家与行政相结合，专家把学术关，行政做好服务工作；三是“探路子”，将顶层设计与具体内容相结合；四是“迈步子”，尽快开展工作，先易后难，先杂后精。并强调要加大向相关领导的信息报送工作，为工作开展寻求更大支持。



(朱艳林)

省志编委调研省委统战部修志工作

近日，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四川省志》总编马小彬到省委统战部调研《四川省志·民主党派工

商联志（1986—2005）》（简称《民主党派工商联志》）编纂工作。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崔保华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志》编纂工作汇报后说：盛世修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修志存史正当其时；修志要从大局出发，真实记录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参政议政、自身建设、服务经济建设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马小彬对下一步志稿编纂工作提出建议：一是做好经费保障以解后顾之忧；二是进一步明确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物入志、奖项入志标准，精选前置图片，写好概述，在统稿过程中合理分配字数容量，文风统一；三是加快统稿进度，通过会议形式做好志稿初审工作。

(邓肖亭)

省志编委调研凉山地方志工作

近日，省志编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调研凉山州地方志工作，指出：史志部门要主动争取党政领导重视，“弱部门也有强声势”；史志干部要勤勉奉献，“冷板凳也能热起来”；凉山史志工作取得的成绩充分证明，“小工作也会有大贡献”。他强调，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党和国家对史志工作高度重视，史志工作发展正处于一个大好时期，史志工作者应有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地方志工作应突出“四个服务”，突出地域和民族特色，突出行业优势，让史志资源活起来，让史志工作真正起到为“经济发展、全局工作、领导决策、社会大众”服务的作用。

(凉山州史志办公室)

省志编委调研叙永、古蔺地方志工作

近日，省志编委副巡视员汪毅到叙永县、古蔺县就旧志整理保护、《水潦彝族乡志》编纂、档案馆建设等开展调研。他建议，要牢固树立依法修志意识，及时协调各种问题，推动修志工作顺利开展；希望各地党委政府进一步关心重视地方志工作，在政策、经费、人员、工作条件上提供保障；要进一步加强方志馆建设，完善功能定位，拓宽用志领域，更好地服务中心、服务大局、服务社会；要进一步加大地情资料开发力度，依托地域和资源优势多出方志成果。

(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四川省志》第二十二次终审会召开

2月3日上午，《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第二十二次终审会议在省志编委会议室举行。《四川省志》审核委

简 讯

员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陈越良出席并主持会议，省民宗委、省保密办、省统计局、省志编委、省社科院、四川大学专家等审核委员会成员参会。



本次会议审查了《四川省志·邮政志（1986—2005）》《四川省志·黄龙志》两个分卷。这两个分卷分别由省邮政公司和黄龙风景名胜管理局牵头承编。会议向《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汇报了两个分卷的编纂情况。审核委员会各成员对两个分卷的保密、政治、体例、史实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审查。终审委员会指出《四川省志·邮政志（1986—2005）》文风朴实、行文流畅、专业性强，但应仔细修改概述，突出四川邮政特色和在这20年间四川邮政经历的三次重大变革；《四川省志·黄龙志》地方特色突出、内容丰富，需完善之处在于前置图片过多，应进一步筛选，同时应进一步充实黄龙特色文化内容。

陈越良代表《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宣布两个分卷原则同意通过终审。会议要求牵头承编单位要严格按照终审会议提出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报送省志编委统一出版发行。至此，《四川省志（1986—2005）》93个分卷中已经有45个分卷通过终审验收。

（邓肖亭）

《德阳春秋》专题化办刊服务时政

德阳市志办主办的方志期刊《德阳春秋》实行办刊专题化，每期集中一个专题，突出“三个结合”，一是与社会时政和热点、焦点话题结合；二是与修志工作结合；三是与深度挖掘利用地情资料结合。专题化办刊，可以依托期刊为载体，深入开展地情资料挖掘利用工作；期刊的目的性、指向性更加明确，可读性明显增强；也使期刊为时政服务、为下一轮修志服务、为挖掘利用地情资料服务的功能得到强化，极大增强了期刊的生存力和生命力。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内江市中区创办方志期刊及网站

近日，内江市市中区志办创办的“甜城史志”网站正式开通。设置“红色甜城”“方志甜城”“魅力甜城”“史志期刊”等史志特色板块，下设“大事纪要”“党史正本”“人物春秋”“红色记忆”“市中区志”“首轮志书”“综合年鉴”“读志用志”“甜城概况”“甜城风情”“甜城书画”“甜城美食”“甜城名胜”等20多个栏目，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版面精美。网站还设有“政务信息”“政务公开”“互动交流”等板块，随时更新政务信息，坚持政务公开，方便公众交流。

12月22日，《甜城史志》创刊号出刊。《甜城史志》坚持立足市中区、面向市中区、宣传市中区，以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区委区政府工作大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办刊宗旨，融学术性、知识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为一体；设置“大事纪要”“资政服务”“红色记忆”“甜城故事”“文化之窗”“岁月留痕”“人物春秋”“社会风情”等栏目，努力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史志工作者、史志爱好者探讨的窗口、交流的园地、争鸣的平台。



（内江市地方志办公室）

宜宾施行《宜宾市〈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

2014年12月17日，宜宾市政府四届84次常务会通过了新修订的《宜宾市〈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并从印发之日起正式施行。新修订的《宜宾市〈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共计24条，明确了市、县（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主要职责；规范和细化了市、县（区）、乡（镇）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审查、出版要求；规范和细化了单位志、行业志、专业志的指导方式和途径；明确了地情资料征集和奖励的具体措施，清晰了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地情资料的运用和地情资料为宜宾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做出了规定；规定了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方式；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工作的鼓励方式和路径。

（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

眉山开展“12·4”法制宣传

12月4日，全国首个宪法宣传日，眉山市志办在三苏雕像广场开展法制宣传活动，面对面向群众宣传地方志法律法规，零距离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现场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使群众了解地方志工作法规内涵，扩大地方志工作的影响。整个活动共计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及咨询200余人次，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眉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巴中着力施行《条例》以贯彻“依法治市”要求

1月6日，巴中市史志办学习市委三届九次全会精神，会议提出，史志部门贯彻“依法治市”要求的重点是认真实施《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一是参与全市法制宣传月活动，开展《条例》宣传。二是建设执法队伍，加强执法检查。三是联系人大法工委，开展《条例》实施情况调研。

（巴中市史志办公室）

泸州纳溪区志办八举措发掘地情资料

泸州市纳溪区为更好的发掘地情资料，采取八项措施加强地情资料收集。一是联系档案馆，组织人员进库查阅，复印相关的档案资料。二是与政协文史委一同开展地情资料收集专项工作，收集建国以来政协出版的

文史资料。三是与文物部门一同考证有关历史文物，收集文物相关故事资料。四是约请知名专家、人士，对纳溪一些重大历史、重要遗址进行考察研究。五是组织志办人员走访抗战老兵、老党员、老干部、老支书、老村长、老教师等，全方位收集地情资料。六是要求乡镇政府联络员多方位收集区域内的重要地情资料。七是深入开展族谱的收集与研究。对族谱的序、综述等进行深入分析和研讨，从中获取《纳溪县志》以及其他档案中未记载的史实。八是带领志办人员走出行政区域，跳出圈子从外围收集考证辖区内的地情资料。

（泸州市纳溪区地方志办公室）

乐山沙湾区地方志工作创“新”三突出

乐山市沙湾区地方志工作以“厚德崇文，坚韧奋进”的沫若精神为己任，大胆创新。一是加强地方志鉴政策宣传，突出一个“活”字。充分利用区志办QQ群，加强联系各单位部门和乡镇，对《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进行连载；并从党政网上编发至各部门和乡镇，送《沙湾年鉴》到单位，让志鉴政策走基层、入家庭、贴群众。二是加强地方志业务工作培训，突出一个“学”字。定期组织全区各单位地方志年鉴撰稿人员，开展培训活动，内容涵盖《地方志工作条例》《沙湾区志》和沙湾区情地情等，并严格目标考核和评选奖励。三是加强地方志工作的重视，突出一个“实”字。区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将其纳入区委政府年终目标考核内容；新调入1名行政人员充实到志办工作；区政府足额预算地方志工作经费；建立地情资料目录，完善方志资料年报制度，拟定志书库建设，编制陈列布展大纲，新征集方志资料36册，正在逐步完善方志文化阵地。

（乐山市沙湾区地方志办公室）

木里加强地方志工作

近日，木里县召开史志工作会议，总结和部署史志工作。县委副书记熊帷茗、县人大副主任杜基次尔、县政协副主席陈福云出席会议，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高晓主持会议。全县各乡镇、县级部门、企事业单位分管领导和业务人员等2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州史志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和部署史志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县史志工作取得的成绩，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史志工作，确保领导、机

构、经费、队伍和条件“五到位”，强化征编、研究、宣教、服务，合力推动全县史志工作迈上新台阶，更好服务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12月4日，木里县举行声势浩大的法制宣传活动。县史志办会同县法制办、县司法局等单位，就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共木里县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实施意见》等史志法规政策开展广泛宣传，印发宣传资料500余份，干部群众反响热烈。

(木里县史志办公室)

越西强化史志工作与队伍建设

按照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范锐平同志关于“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通盘考虑史志干部的培养使用，决不能把史志部门作为解决干部职级待遇的部门，要培养专业型史志领导干部”的要求，越西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健全完善县史志工作机构，配齐配强工作班子，在全县选调思想素质好、专业水平高、乐于奉献史志事业的年轻同志到史志办工作。至此，全县史志办6个编制全部配齐。同时，强化史志管理与督查，将史志工作拟纳入2014年度目标绩效管理项目在全县征求意见，以确保史志工作全面发展。

(越西县史志办公室)

《德阳掌故(修订版)》出版发行

《德阳掌故》是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2005年编纂出版的一部广受读者喜爱的地情书籍。2014年，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对《德阳掌故》进行修订，增补了新的故事，并根据故事内容增加大量的手绘图照；删掉了原书摘自《三国演义》《太平广记》《搜神记》等古书和与“掌故”不相符的篇章；修改了一些文言文和类目题目名称；调整了个别篇章位置；统一规范了时间纪年和数量的表述方式。全书由原来的123则故事增加到152则，其中新增故事约70则，新增图片120余幅。《德阳掌故(修订版)》把有关德阳历史和传统的叙述变得不再冰冷与生硬，更能照顾读者阅读习惯，帮助读者更好的认识德阳，了解德阳。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绵阳首部佛教志书《净安寺志》问世

近日，绵阳市首部佛教志书《净安寺志》内部印刷发行，字数36万字，文字396页，彩图25页。该志上限为隋唐，下限为2014年7月。其编纂宗旨为：传承佛学文化，服务社会，造福乡梓，净化人心。篇目内容包括大事记、概述、重建、佛事、管理、人物、善举、袁焕仙和南怀瑾、艺文、杂记、文存、附录等。该志是盐亭县首部佛教志书，填补了绵阳市同类志书空白。

(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安概览(1993-2005)》出版发行

12月16日，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的《广安概览(1993-2005)》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采用章节体，设置建置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章，章下设节，节下一般设两个层次，全书26万字。该书是在《广安市志(1993-2005)》的基础上，重新设置篇目结构，选取重点历史事件，精炼文字内容，概括记述各行各业的重要史料，重新编纂整理而成的。主要收录了1993-2005年广安建区设市以来的重要史实，系统记述了建置沿革、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集中展示了广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既是一本广安历史和市情教育读本，又是一本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还是一部史料广泛、实用性强的社会查阅性工具书，具有资政、存史、育人的作用。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甘孜州首部地方志编修业务工具书问世

近日，甘孜州地方志办公室采取“合作出版”的模式编纂出版地方志编修业务工具书——《说说地方志编纂》。该书共计10万余字，分十五章十五节，较为翔实地介绍了地方志编修的历史、编修常识与编修方法。其中，《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述要》和《续志编修初探》两章节为全书重点。这本饱含着笔墨芳香和“修志人”情结的工具书必将对广大修志工作者有所启迪和帮助，对全州地方志事业大有裨益。

(甘孜州地方志办公室)